

中央大學 余紀忠講座

近世中國的 輿論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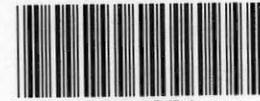
王汎森院士

講座實錄

771

Library of an
ry
7)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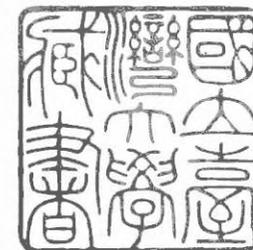


4084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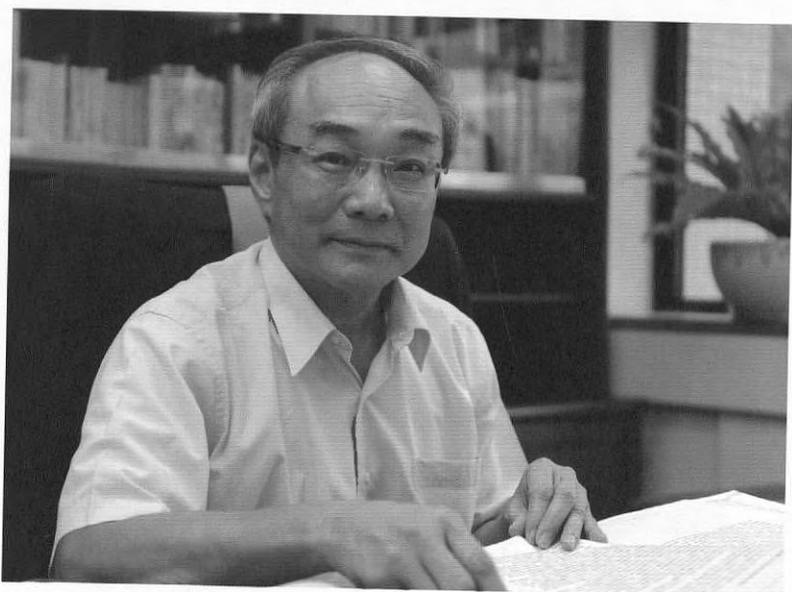
余紀忠講座



王汎森：
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



4084951



王汎森院士 簡介

王汎森院士，臺灣雲林縣北港鎮人。歷史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主要從事思想文化史、學術史以及史學史的相關研究。

王汎森院士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就讀普林斯頓大學時為余英時院士的學生。返臺後任教於臺灣大學、清華大學。教學嚴謹，並重視啟發，曾培育多位博碩士生。王院士的學術專著，不僅是學術界討論的焦點，也深受一般讀者的喜好。此外，王院士年輕時即雅好書藝，並時常有書道創作。近年其書法曾在海內外多所大學院校進行過展覽。

學歷

- 1980年 臺灣大學 歷史學系 學士
 1983年 臺灣大學 歷史研究所 碩士
 1992年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東亞系 博士

經歷

- 1985-1993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993-1998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1994-1995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所長
 1998-2005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1999年 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
 2000-2002年 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處副處長、處長
 2003-2009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2010-2016年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2017年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客座教授
 2019-2022年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榮譽教授
 2020-2023年 香港大學冼為堅傑出客座教授
 2005年 至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2004年 至今 中央研究院院士

榮譽

- 第12屆金鼎獎（1987）
 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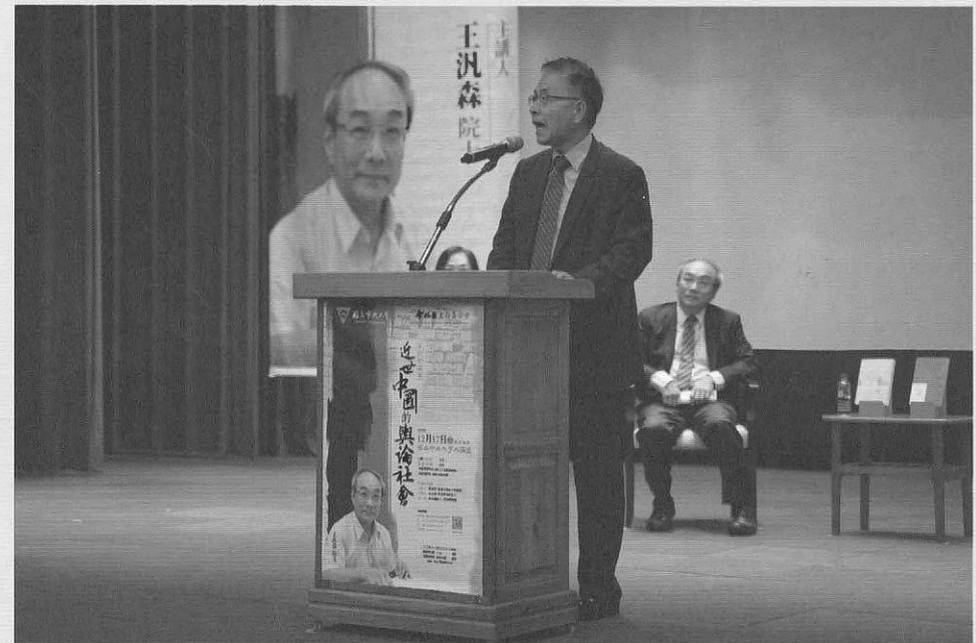
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2005.7）

韓國坡州出版獎（Paju Book Award）最佳企劃獎（《中國史新論》，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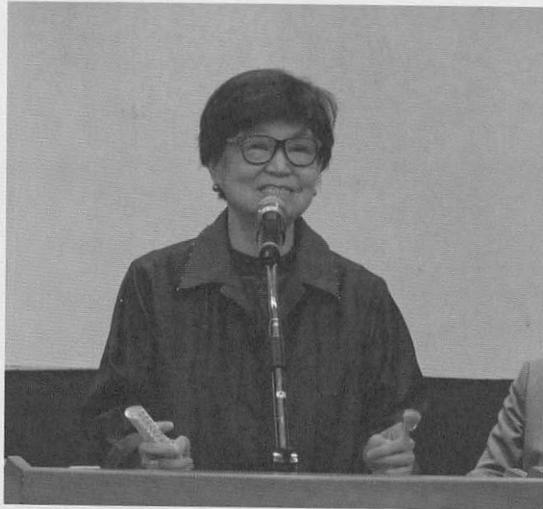
講座

- 1998-2003年 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2005年 東海大學「劉崇鉉講座」
 2005年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史學名家講座」
 2006年 中興大學「惠蓀講座」
 2009年 香港中文大學「丘鎮英講座」
 2010年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牟復禮紀念講座」（F. W. Mote Memorial Lecture）
 2011年 復旦大學「光華傑出人文學者」講座
 2011年 香港城市大學「傑出學者講座」
 2011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吳德耀文化講座」
 2012年 香港中文大學「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
 2012年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Yip So Man Wat Memorial Lecture」
 2013年 四川大學「徐中舒紀念講座」
 2016年 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座（Peking University Global Fellowship）
 2016年 中山大學「院士講座」
 2016年 成功大學「成大研發論壇」系列講座

- 2016年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分校中國文化大講堂
 2016年 政治大學博雅講座
 2018年 浙大馬一浮講座
 2018年 東吳大學「劉光義教授紀念專題講座」
 2018年 政治大學潘黃雅仙人文講座
 2018年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系中國歷史專題講座
 2018年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四十周年誌慶講座」(Ruby Lecture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2019年 中央大學「余紀忠講座」



周景揚校長致詞



余範英董事長致詞



中文系呂文翠教授受邀擔任引言人和與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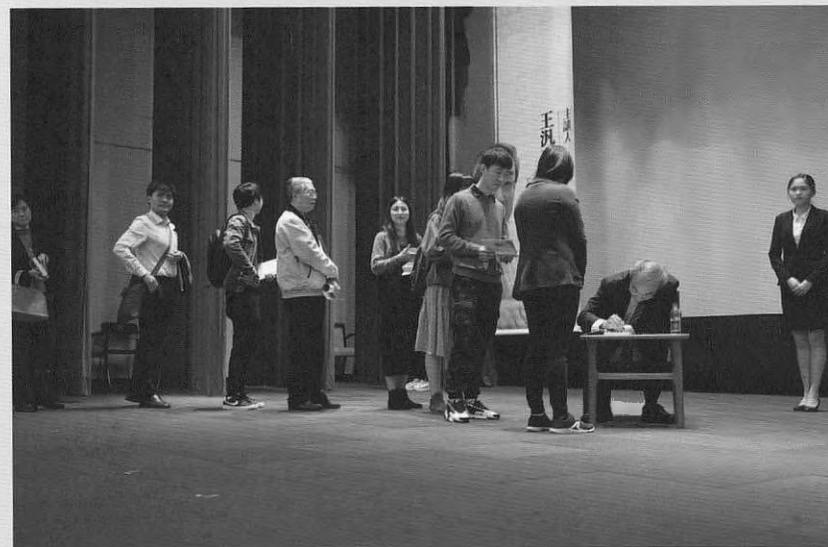
王汎森院士主講「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的風采



「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講座盛況



王汎森院士專注回應來賓提問的神情



王汎森院士演講後簽書會盛況



王汎森院士專注的神情與軒昂的揮毫氣勢



校內外嘉賓合影

一代經公 官學兼光

設置緣起
中國傳統經學人紀念堂為國立中央大學經學堂，旨在弘揚中華文化，發揚經學精神，以「中國經學」為宗旨，為學術界、教育界、文化界人士提供一個交流、研討、展示的平台。本館特設「王汎森院士書架」，以紀念王汎森院士對經學研究的卓越貢獻，並藉此推廣經學研究，促進學術交流。本館將定期舉辦各類學術活動，包括講座、研討會、展覽等，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歷年講者

1992年 余紀忠先生	1993年 余紀忠先生	1994年 余紀忠先生	1995年 余紀忠先生
1996年 余紀忠先生	1997年 余紀忠先生	1998年 余紀忠先生	1999年 余紀忠先生
2000年 余紀忠先生	2001年 余紀忠先生	2002年 余紀忠先生	2003年 余紀忠先生
2004年 余紀忠先生	2005年 余紀忠先生	2006年 余紀忠先生	2007年 余紀忠先生
2008年 余紀忠先生	2009年 余紀忠先生	2010年 余紀忠先生	2011年 余紀忠先生
2012年 余紀忠先生	2013年 余紀忠先生	2014年 余紀忠先生	2015年 余紀忠先生
2016年 余紀忠先生	2017年 余紀忠先生	2018年 余紀忠先生	2019年 余紀忠先生
2020年 余紀忠先生	2021年 余紀忠先生	2022年 余紀忠先生	2023年 余紀忠先生

活動簡介
本館定於12月17日(星期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在中央大學圖書館舉行「王汎森院士書架」開幕典禮。屆時將邀請王汎森院士親臨主持，並由余紀忠先生致詞。典禮內容包括：王汎森院士書架揭幕、王汎森院士致詞、余紀忠先生致詞、王汎森院士書架捐贈儀式等。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主講人簡介 王汎森 院士
王汎森院士，臺灣著名經學專家、歷史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玄奘大學歷史系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所長。

學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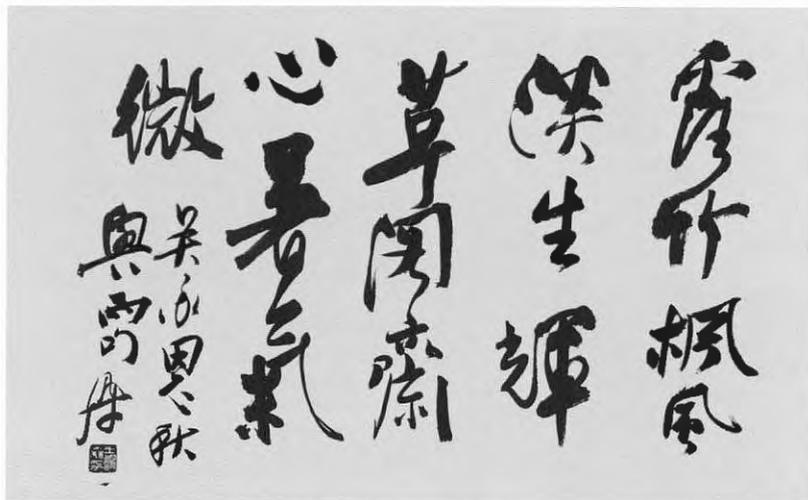
1970年	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系 碩士
1973年	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系 博士
1980年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
1985年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所長
1990年	中央研究院 代理院長
1995年	中央研究院 副院長
1999年	中央研究院 代理院長
2003年	中央研究院 副院長
2007年	中央研究院 代理院長
2011年	中央研究院 副院長
2015年	中央研究院 代理院長
2019年	中央研究院 副院長
2023年	中央研究院 代理院長

108年余紀忠講座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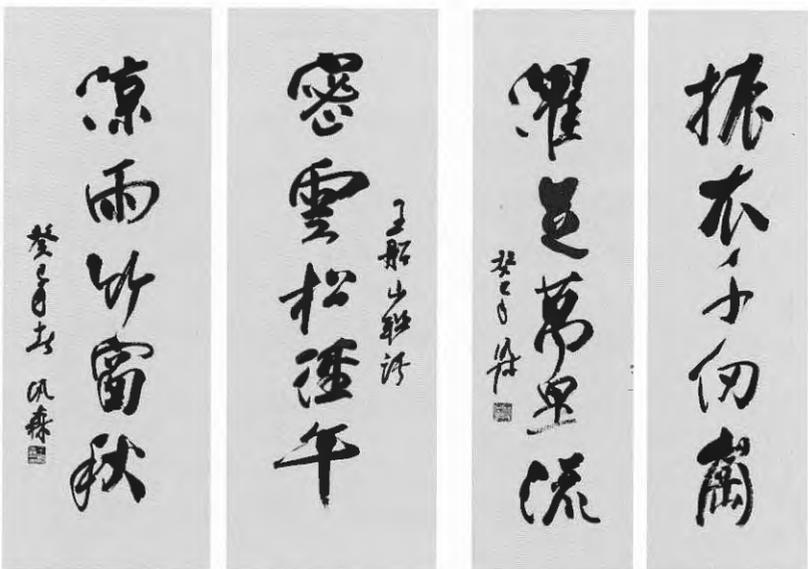


中央大學圖書館舉辦王汎森院士重要著作書架展示

| 王汎森院士書法作品 |



「露竹桐風淡生輝，草閣齋心暑氣微」
吳承恩〈秋興〉兩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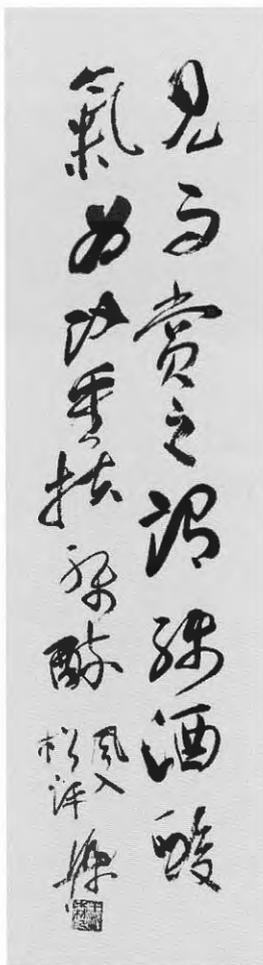
「密雲松徑午，涼雨竹窗秋」
王夫之自題湖南省衡陽湘西草堂



「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
左思〈詠史〉八首之五



「從來名士能評水，自古高僧善鬥茶」
鄭夔〈題揚州青蓮齋〉



「見而賞之謂『殘酒』酸氣為改『重扶殘醉』」
宋高宗趙構評俞國寶「風入松」詞

余紀忠講座



王汎森：
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

| 目次 |

- 18 致詞一 / 周景揚
20 致詞二 / 余範英
- 23 引言 / 呂文翠
27 講座：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 / 王汎森
57 對談：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 / 王汎森·呂文翠
- 63 回應一：輿論社會、國家性質與未來危機 / 黃克武
71 回應二：訊息傳播與大明興亡 / 王鴻泰
- 77 附錄一：王汎森院士著作目錄
89 附錄二：余紀忠講座編目
91 附錄三：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暨中央大學余紀忠講座介紹
- 93 編後記 / 李瑞騰



【致詞一】

周景揚（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王汎森院士、呂文翠教授、余範英董事長、鄭崇華董事長、劉兆漢校長，還有各位貴賓、各位老師、各位同仁、各位同學大家早。首先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由我們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跟中央大學合辦的2019年余紀忠講座，今年是第十二屆了。

我們知道中國時報的創辦人余紀忠先生，是我們中大最傑出的校友之一，對國家社會都有非常大的貢獻，從2008年開始，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與本校共同創設了余紀忠講座。所以我們每年會邀請於學術界具有崇高學術地位的學者，以不同的主題來講演，來展現本校對人文關懷、對理工科學以及大學教育的重視。當然，也彰顯余紀忠先生對國家社會關懷的理念。而中大師生也極為慶幸，能參與每年這最具代表性的知識饗宴之一。

今年我們特別邀請王汎森院士來擔任講座演講人，王院士

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他曾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主要是從事思想文化史、學術史以及史學史的相關研究。我現在的介紹都是比較知識性的介紹，余範英董事長與王汎森院士非常熟悉，她將為各位介紹更為不同的王院士故事。

王院士是我們余紀忠講座的發起人之一，他自己多次參加這個講座，從第一屆他的老師余英時院士來擔任講座演講人時，他就開始參與。然後金耀基院士來演講的時候，他也擔任引言人，這一次由他自己上陣。今天他要跟我們講〈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我們非常榮幸，預祝今天的講座順利成功，謝謝大家。



【致詞二】

余範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王院士、周校長、羅校長、鄭董事長，大家早。今天的余紀忠講座，我要介紹一個我很熟悉的朋友，我講熟悉是抬舉我自己，但是我們兩個絕對不陌生，因為王院士是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現任的董事，是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公與義」的發起人，也是今天余紀忠講座最重要的推手。在這個場合，不禁讓我想到第一次跟王汎森認得是在37年以前，在中國時報於宜蘭的棲蘭山莊舉辦的一場研討會。

那場研討會，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叫做「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人文與社會科技的探討」，參加的都是一時之秀，有余英時、楊國樞、胡佛老師等等，民國七十年代，在外在的環境，我們走過外交孤立，在內部的發展當中，對政治、文學跟思潮來說，是個辯證的年代，臺灣正在發展經濟，從事基礎建設。

在那個動盪的時代裡面，我父親和一群朋友，常常奔走於黨內外，見證威權，捍衛自由，公共輿論形成了跨時代的變化，臺灣就是這一群海內外熱血的知識分子打下的共同基礎。相信汎森兄跟我一定會記得，那個時候，我們都是很年輕的媒體工作人員，汎森在大學裡，然後到了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是

我們吸納的有思想、有熱忱的一位年輕學者。

我是初從國外回來的、投入家業的年輕人。我們那個時候得到的薰陶和心裡的激盪，是我們共同的回憶。這也是我父親跟汎森開始的淵源。汎森在那個時候關心的是時事，他要追尋這個事實的過去，形成了他今天在走的路，這個根基是這個斗六出生的年輕人一生最重要的開始。

汎森常常跟我說，有兩位姓余的影響他很深，一位是他的老師余英時，他那個時候認得余英時老師，跟他到了普林斯頓。另外一位是我的父親余紀忠，我的父親曾經跟他說，不要局限在象牙塔裡，希望他出世之外能夠入世。講到汎森，我一定要講跟他認識的這一段過程。我跟他認識是在「公與義」這個名詞發起時刻，那時有錢永祥、黃榮村、朱雲漢、林子儀，還有王汎森。我們身處在這個時代裡，覺得大概也要講一點話，也要有一些參與，所以定名「公與義」，走進未來的公民社會。

汎森在國科會的時候來找我，說他對資訊科技衝擊社會，深有同感，也有惶恐。他覺得這樣的社會工程應該推動。後來當基因科技的衝擊引發討論的時候，他又來找我，我們前後辦

了十三場活動。這就是汎森，他對於社會的變化跟科技的衝擊是有感覺的。一向認為學術研究是他終身之職的汎森，在多元社會不容易磨合的紛紛擾擾當中，汎森幫我找了幾位老朋友。朱雲鵬、林萬億這些人，不管是社會學者，不管是經濟學者，他真正是跑斷腿，一個個去結合。然後他推動了這一本書，《再造公與義的社會與理性空間》，我珍藏著。我最近看到汎森，在中研院副院長期間，在繁瑣的行政當中，他知道世間事是不容易處理的，就是學術殿堂也一樣，但他處理得很好。

這些所有的經驗，汎森都吸納了。所以他在他的書《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裡面強調「我在故我思」，而非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他在經歷他的人生，淡然的處置自己的生活，卻能熱情的面對社會的變遷。這樣一個朋友，我在他的身上學習到很多，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裡面，我看到中國思想史在近代是寂寞的，是空白的；但是冷僻的東西裡面有穿越時空的心血，汎森在做這樣的事。我不知道大師是怎麼形成的，但是真有文采的，能夠跨越時空，對傳統能夠有所尊重，對現代生活周遭的民眾能夠有所關懷，這樣的一個朋友，他不找我，我永遠會找他。

我在這裡介紹王汎森院士，他曾經跨越了歷史看今朝，所以對於他今天要談輿論跟社會應該扮演的角色，我真的很想聽，你們呢？這會是一場精彩的演講，我平常不介紹這麼多，也不把我私人的感情在這樣流露。有這樣一個朋友，我實在很驕傲，謝謝各位。

【引言】

呂文翠（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余董事長、校長、還有王院士，在座與會的嘉賓，大家好。今天非常榮幸擔任余紀忠講座的引言人，接下來我會用幾張投影片來呈現我的引言。剛剛由余範英董事長為我們介紹本校每年一度學術思想以及文化的盛宴「余紀忠講座」，王汎森院士就是最主要的推手。我們也記得在第一屆余紀忠講座（2008年）由他的老師余英時院士蒞臨本校主講時，他曾擔任與談人，提到在南京時期的中央大學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跟當時主張「全盤西化」的北京大學新文化運動領袖們，有相當不同的意見。他強調由中央大學梅光迪、吳宓等先生創辦的《學衡》雜誌，豐富了中國近代新文化運動的內涵與深度。這些都說明了他一直以來與本校「余紀忠講座」的不解之緣。

王院士治學的簡歷，容我在此稍做介紹。他是臺灣雲林縣北港鎮人，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學士、碩士。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1987-1992），師從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先生。他主要的研究興趣是明清到近現代中國的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史學史，還有很重要的是東亞文化的交流史。近年來將觸角延伸到中國的「新傳統時代」，包括往上推到宋



代以降的理學思想的政治意涵。在此過程中，他的幾部重要的著作與學術成就獲得了國內外學界的殊榮。

我們比較熟知的當然是2004年王院士當選了中研院的人文社會學科的院士。2005年，他是臺灣學界第一位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殊榮，皇家院士頒給外籍人士的標準是格外嚴苛的，所以王院士能夠獲選這個歷史學會的「會士」，堪稱臺灣的驕傲。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亞文化交流史方面，2012年曾由東亞地區的出版人與學術界、文化界共同創立的「坡州圖書獎」，頒給王院士「最佳企劃獎」。這個獎是因為王院士在中研院史語所「80週年慶」時策劃了「中國史新論」一系列叢書，分冊包括思想史、宗教史、美術考古、科技與中國社會、基層社會、性別史、法律史等等，視野闊闊，蔚為大觀。以上這三個獎，充分顯示了王院士從臺灣走向世界，以及在東亞文化交流史上作出的重要貢獻。

今天上午在本校圖書館為王院士的書架揭牌，可以看出王院士著作等身，散見報刊的各類文章更是族繁不及備載。因此在投影片上我只能將他的主要著作扼要羅列，從他碩士時期開始，碩士論文《章太炎的思想》，到博士論文《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呈現了他對清末民初重要思想家與歷史文化發展過程的精深研究。此後，他往上推到明代，對晚明的心學和清初的思想家跟史家展開細緻探討。2011年，他更投入了「經典普及」的工作，誠如余範英董事長提到余紀忠先生曾經說過知識份子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我個人也認

為學者困守象牙塔，向來就是我們需要自我警惕的，這部介紹清初三大儒之一黃宗羲的經典名著《明夷待訪錄》，王院士以深入淺出的文字敘述，配上插畫家的漫畫及繪圖，圖文並茂的方式，展現了將精微的理論普及於大眾的一個重要嘗試。另外，2013年、2014年出版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跟《執拗的低音》這兩部著作，可以看到王院士針對歷史上的主調跟低音，兩者之間的辯證、競合的現象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還有我要特別提到2018年的《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2019年他將曾在《南方週末》期刊上發表過的一些雜文，與其他文章集結成冊的《天才為何成群的來》，這兩本書尤其對人文領域的研究生，特別有用處。《天才為何成群的來》裡面收了一篇文章〈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應該是王院士的演講之後修訂的文章，對吧！我覺得對於研究生而言相當具有實用性，在他們的學習歷程中幫助很大。

總而言之，今天的講題是在幾百年的長時段內，從多元文化抽出一條對社會歷史運動有影響的輿論脈絡來討論。近代歷史上的「公車上書」、《新民叢報》、《新青年》等等文化事件與輿論，對整個社會思潮、政治風氣的巨大影響，可能是王院士在接下來的講座將會提到的。由黃宗羲到梁啟超之間，思索輿論是如何與歷史事件相伴而生，又是怎麼藉由公共空間傳播發散。不同時段中的知識份子與政治輿論，如何對話比較？又如何成為歷史延續？即使觀念未必成為輿論，輿論背後未必有深刻的學術思想，但是在整個社會運動中，總是不可缺少輿論的推動力。



那麼，現在這個資訊爆炸，網路社群跟自媒體蓬勃，各類標榜超越政治立場、種族、性別還有階級差異的數位傳媒影響力不容小覷的當今世界，王院士的講題〈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將帶領我們通過另外一種方式鑑往知來，迎向多元思潮變化萬端的年代。

各位一定跟我一樣，迫不及待要聆聽王院士的演講，有請王院士。我的引言就到這裡，謝謝各位。

最後補充一下，投影片背景是王院士揮毫《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的〈秋興〉詩「露竹桐風淡生輝，草閣齋風暑氣微」的書法，這是從香港城市大學「院士書法展」網頁上找到的圖片，大家可以欣賞一下王院士精湛的書藝。

【講座】

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

王汎森

* 本文最初是我在國家圖書館「操控媒體：明以降中國的新聞與『假新聞』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在「余紀忠講座」中，我又將文章的規模擴大。由於是演講，所以只能粗枝大葉地談，在準備演講過程中，我參閱了許多書，不及一一註出，其中包括，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臺北：學生書局，1964）、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1999)、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尹韻公，《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李江杰，《明清時事劇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4)、許軍，《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等書，以及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臺北：稻鄉，2005)、程麗紅，《清代報人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鄧小南，〈信息渠道的通塞：從宋代「言路」看制度文化〉，《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譚徐鋒，《察勢觀風——近代中國的記憶、輿論與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待刊)、王鳳超，《中國報刊史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Roger Cha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等等。但如在文中隨處提到書名的，在這裡便不特別列出。本文修訂過程中，何淑宜教授及譚徐鋒博士提供許多寶貴的建議，在此特別致謝。

以這個題目作為「余紀忠講座」的講題是有特殊考量的，余紀忠先生雖然經歷過許多工作，但從1950年起到他逝世為止，他始終是一位報人。所以當我接獲邀約演講時，自然而然地覺得應該從歷史的角度，對「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這個主題做一些討論。

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是一個非常廣泛而複雜的問題，我個人從未針對它做過專門而系統的研究，所以今天只能針對幾個我一向比較關心而略有積累的問題作一些觀察與報告。

我個人之所以關心「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這個議題，與二、三十年來對明清時事小說跟時事劇的新聞傳播性感到興趣有關。我一直認為，在探討「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主題時，不能只侷限在新聞史，而忽略了時事劇、時事小說等帶有「半新聞」色彩的或帶有「模糊的客觀性」的傳播載體所起的作用。過去雖然有一些討論時事劇或時事小說之類的文字，但很少從新聞、輿論這個角度加以詮釋。

—

訊息傳播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一個事件如果未經傳播可能只有「點」狀的影響，一經傳播，則擴充為「面」。傳播「規模」(scale)的大小，也影響到事情的性質。

過去對於明清社會輿論的研究多以邸報、邸抄、小抄、小報、宮門抄、轅門抄等史料為基礎，很少注意到時事劇、時事小說，還有各種歌謠所產生的新聞傳播作用。在當時，它們的傳播效果恐怕不能輕估，但是一般都被當作文學材料處理，而少從傳播方面的角



度加以評估。這些文獻的創作，有許多是還在進行中，或是剛結束的事件，故具有「即時性」。因為對訊息傳播轉變的題材有興趣，而開始關注明清時期媒體與輿論社會訊息傳播的轉變。我認為從晚明社會一直到康熙二十年左右，可算是個傳統的輿論社會，到了晚清因為新式報刊的引進變成新式的輿論社會。

要解釋輿論社會的出現，首先要談邸報的問題。明清討論消息的傳播，有邸報、小抄等等，包括書本、謠言、街談巷語、揭帖等。這些文獻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它們的規模到底有多大呢？它們的發行人到底有多少呢？都是值得注意的。

邸報在明代最盛的時候最多就一萬份，而且是「政府公報」的形式，所以對很多社會新聞它是沒辦法收錄的。邸報的性質跟近代報紙是不一樣的，邸報、邸抄因為帶有「政府公報」的性質，故主要在仕宦或士人階層間流行，但可以以其他傳播方式滲透到更下層的社會，包括用口傳、演戲等等，使一般人也能看到，但是內容則侷限在政治新聞而非後來出現的社會新聞。

所謂的邸報主要根據尹韻公所說的「殊批章奏傳下後，六科或通政司把這些章奏編纂或輯成朝報。在京的各衙門要想知道朝報的內容，或者派自己衙門的書手來六科廊房抄傳，或者由六科派人分別抄出」，其中「在京衙門」不只是各省，還包括其他中央機構。由於每天發下來的公文很多，無法全抄，所以在京衙門，每每就各自相關的部份去抄，所以內容也會有一些不同，內容的實用性也非常強。一層一層抄下來，像樹枝一樣散開。收藏邸報的人顯然很多，明末，顧炎武（1613-1682）的父親，雖然是地方上的小讀書人，但也收藏了幾十年的邸報。過去士人常把邸報當成書一樣在

看、摘抄，所以許多重要的史書，像明末清初談遷（1594-1658）所撰的明朝編年體史書《國榷》，還有像張岱（1597-1689）的《石匱書》，便多以邸報為基礎寫成。邸報是生命短暫的文獻，即使在當時也沒有完整的收藏。邸報是官方性質的，所以政府對邸報有一定程度的管制，就是沒有經過批准，非正式的內容不可以抄錄。曾經發生過一個例子就是，邸報已經發表某一個官職由某人派任，但後來沒有正式批准，卻因邸報早已將消息散出，所以這個任命案居然弄得天下皆知。

雖說邸報一般以皇室救命、官吏升降、尋常諭摺為主，但事實上並不是那麼膚淺無聊。以《萬曆邸抄》為例，雖然是由不知名人士按時代先後摘抄萬曆朝四十五年的邸報而成（只差三年，便是整個萬曆朝了）。但從這份珍貴的文獻中可以看出邸報的內容有時相當生動有趣，經常反映了明代後期皇帝與大臣們無休無止的鬧意見、爭勝負的實況。臣下為了表示自己的品格與志節，經常為大小事上奏，而皇帝每每是在大怒之下，以貶官或降罰的方式回應，套用《萬曆邸抄》中所引用皇帝的話：「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朕將何以治天下？」

邸報往往比較信實，顧炎武〈與潘次耕書〉中說：「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為主」。而且人們經常從邸報中得到一些立即性的消息，譬如史可法（1602-1645）崇禎十二年給他父母的信中用興奮的口氣說：「京報已斷月餘，忽得十二月十八起至二十三日報六本……」，可見邸報對他了解時事的重要。又如咸豐年間徐鼐（1810-1862）在他的《徐鼐自訂年譜》中提到，在太平天國戰亂時期，徐鼐從邸報中知道他的好友呂賢基（1803-1853）等殉職，



並在千里之外為他們設祭。

邸報之外還有小報，小報有近千年的歷史。小報也是在政府的監視之下，宋代屢屢查禁小報，但有時統治者無暇顧及，則言論便相對寬鬆。明清兩代民間報房，是從提塘報房分離出來的，自立報房、自行營業。清代有名號的民間報房不下十餘家，報費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但其讀者仍以官僚、士大夫為主。小報處理的信息則比邸報靈通，新聞時效比較強，官報不及報導或不敢報導者，或是比較敏感的政事，往往由小報披露。它們的經營者往往帶有官民混合的性質。

有許多小報、小抄是抄邸報的人另外私底下所寫的。小抄帶有比較強的社會新聞性質。而三者之外還有大量的揭帖，¹將一兩張紙反覆傳鈔、擴散後就可以讓一件事情喧騰多時。像大家所熟悉的，明朝大畫家董其昌（1555-1636）強占人家僕人的漂亮女兒，有人編了一部社會新聞時事劇《黑白傳》到處演出，等於是時事報導。同時一張一張揭帖發到上海及很多地方，競相傳播「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最後激起民怨，導致董家大宅數百間房舍一夕間被人們糾眾燒掉。

¹ 上書管道不暢，只好依賴其他的手段的事情在歷史上並不罕見，以明末的傅山為例，說明揭帖的輿論功用。傅山年輕時曾受知於提學袁繼咸，袁繼咸後來被巡撫張孫振所誣而被逮，傅山約同學曹良直等寫好章疏，列名百餘人，投到通政司。但通政司參議是孫振的黨羽，遂將之駁回，三投三駁，最後雖然勉強收下但仍未上呈皇帝。傅山等人見正常管道不通，於是印揭帖數十百本，凡遇老小中官即給一冊，最後引起皇帝重視與干預。這個故事幾乎大部分傅山的傳記都會提到（見《傅山全集》第七冊附錄）。

時事的流傳還可以有時事小說、時事劇這種形式，長短不拘，而且它會影響很多事情。時事劇、時事小說寫的事件大多是一、兩年內或是兩、三年內發生的（當然也有達十年的情形），都是很近的事情。所以我們在討論社會輿論的產生時，必須把它們列入考慮。當時這種書約有幾十種，但存世的並不多。如明代名劇《鳴鳳記》，劇情描述文人反對權臣嚴嵩（1480-1567）、嚴世藩（1513-1565）父子的事蹟。在嚴嵩失勢、嚴世藩伏誅之後，這部具有高度寫實色彩的劇作，立刻被搬上戲台。上演的時候，有人邀請當地的縣令去看，縣令不敢去，邀他的人拿出邸抄跟他講嚴嵩父子已經垮臺了，那位縣令才敢赴約，可見這齣時事劇是非常及時的。

明代有一部由世家子弟張積潤所作的傳奇戲劇叫《雙真記》，因為內容諷刺魏忠賢（1568-1627）的附庸朱雲萊，雖然朱雲萊曾撰文反駁，可是等到朱氏過世後，其後人想要把他送進鄉賢祠的時候，當地人就說不行，因為以前那部戲把他寫得太壞了。所以這些半真半假的時事劇或時事小說，對當時輿論有很立即的影響。像崇禎皇帝殺掉熊廷弼（1569-1625），其中有一個小小的導火線，就是東北傳來了一部時事小說《遼東傳》，當時有人認為是熊廷弼為自己敗戰卸責而寫的，熹宗皇帝看了這部小說大怒，最後決定要把熊廷弼殺掉。這些戲曲、小說雖然未必有全部的根據，可是它對現實的情勢仍發揮極大影響。又如清初江寧書商刊印時事小說《萬金記》諷刺官員收受賄賂，順治皇帝就是看了《萬金記》才引發了清初的第一場科場案。《萬金記》雖然是真假混雜的時事小說，但它對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後果。

史書有時也受到時事劇或時事小說裡面未經查證的東西的影



響，像李自成（1606-1645）旁邊有個李岩，1944年郭沫若（1892-1978）出版的《甲申三百年祭》裡面，大講李公子如何如何，中國大陸有很多學者，包括像樂星等人認為李岩無其人，李岩是《剿闖小史》裡的人物，後來竟被寫進歷史。李岩這個人是否存在，真假難辨。

有些時事小說像即時新聞般，隨著時間的發展不斷改修，如前面提到的《剿闖小史》，它改寫過三次，每一次都跟著時事的變化而改變。從期待吳三桂（1608-1678）來救明朝，到最後認識到吳三桂投降的本質，完全就像今天的報紙一樣。時事劇或時事小說上演、刊行的速度很快，所以才會有明人鄭之文《白練裙》雜劇裡面上演名妓馬湘蘭的戲情，還請到當事人馬湘蘭來觀看。

王鴻泰教授的博士論文〈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曾引明末清初姚廷遴（1628-1697）所撰《歷年記》。《歷年記》為姚氏自崇禎元年（1628）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的個人日記，裡面講他們對北方情形的瞭解多是靠《剿闖小史》這本書來的。該書很快就寫成，並流傳到南方，讓那些南方世家大族得以瞭解北京的動態，曉得要如何因應。又如晚明崇禎十六年很有名的湖北麻城奴變，過去對於這個大事件在地方志等文獻中有片段的記載，而《兩鬚眉》一劇則對其前因後果交代得相當詳細。但是《兩鬚眉》的重點仍在表揚黃禹金的忠義，所以麻城奴變的前因後果雖然寫清楚了，但我覺得對「奴變」這一件事本身它寫得還是不夠。

前面說過這些時事劇、時事小說成書多在事件發生的那一兩年，或三、五年內，所以具有很強的報導性。而且因為事情發生不

久，這些小說或劇作就出版或演出了，所以它在描寫日常生活中的細節時，不能胡說八道，如果對生活細節的描述出入太大，當代讀者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們如果要重構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史中的許多細節時，我個人認為也有賴這一類的文獻。如馮夢龍（1574-1646）寫的《王陽明靖亂錄》（又名《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這本書在晚明流傳非常廣，這也是一本類似時事小說的書，主體還是根據錢德洪（1496-1574）編修的嘉靖版《王陽明年譜》改寫。兩者當然有出入，《王陽明出身靖亂錄》稍微神話點，但晚明人要瞭解王陽明（1472-1529）事跡，有許多是從這裡入手。我想時事劇或時事小說中的很多細節，其實就是當時生活的細節，而這些細節在以描述朝代興亡為主的正史中常常是不提的。

此外，我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一書中，曾提到清初有一本名為《人天樂》的戲劇，裡面有不少篇幅在討論李卓吾（1527-1602）、金聖嘆（1608-1661）的思想，像這類創作，其實一方面傳播新聞，一方面傳播思想，頗有意思。

綜合目前可見的幾十部時事劇或時事小說，以及我在明代一般記載中所爬梳到的小說、戲曲、揭帖、謠言等零零碎碎的材料。我得到一種觀察，即我們今天所重視的「知的權利」，只是這些文字所關心的一環。更重要的是以下的意義：首先是現實的作用，如在現實生活中歌頌一種人物典型、一種價值、一種道德訴求，或是揭人隱私以滿足政治權力、甚至是現實政治的鬥爭。動員門客、寫手，作各種報導性質的時事劇、時事小說「互打」的現象亦所在多有。



但是造作時事劇、時事小說之類的活動，還有更深的一層意涵，它們似乎常常是為了樹立或維持某種民眾自己所認可的「道德標準」而作。它們多少帶有褒貶、批評、期待的意味。故它們在報導、揭露之外，同時還藉此維持一般人所認可的某種「標準」——人們所認可的標準、道義、人情義理、合理的利益等，而這些是當時官方或豪強所不顧的。有時他們也嘲弄政治權威、表達不平、憤怒，好像要藉此維繫他們所認為的公平、道理，有時是無權無勢的人靠著一支筆來維持些什麼、對抗些什麼。寫作者往往有一種潛在意識，認為自己是在書寫歷史。敘述那些史書或地方志還沒記載，而目前正在發展的時事。

有時似乎可以看出人們是藉著書寫以維護鄉里秩序，或是對沒有明文規定，或即使有明文規定，但是礙於現實無力維持的一些標準：如對老百姓的委屈，看不慣的時事，老牛吃嫩草、有權位的人強娶或玩弄下人女子進行報導、揭發，引起人們同仇敵愾，甚至同聲討伐。常見的結果是它們既維繫了人情義理或道德，卻同時也沖垮了秩序，他們攻擊貪官污吏，卻也同時瓦解了政治權威。在造作謠言、揭帖、小說、戲曲時，人們似乎在建立自己某種特殊的「管轄權」，這些「管轄權」的範圍與官方有所出入。他們似乎也在對社會國家事件建立某種詮釋的權力與方式，這些舉動，對道德與習俗，或各種權威起著微妙的形塑力量。當然被報導、被攻擊的官紳或豪勢之家也往往起而對抗，或試著找出作者，施壓告官，或者也造作故事，鼓動輿論加以對抗。

時事劇常常讓人覺得它們與史書所描寫的七八成相符，可它總有兩三成基於特定目的，或為把人描寫得更完善，或是為了打擊敵

對的人等等，而使得內容部分出現扭曲。時事小說、時事劇可能因為太時事化了，隨著清初言論控制加強，康熙二十年以後，慢慢代之以描述才子佳人愛情的歷史劇。歷史劇往往在諷刺個別的事情，但是只有內行人看得出來。直到晚清同治以後，時事小說、時事劇才又發展起來。

由上面對時事劇、時事小說的討論，我想強調：我們每每忽略了「半新聞」或「拼貼」式新聞的作用。以前人對所謂「新聞」的態度，似乎容許「模糊的客觀性」或「半新聞」，這裡的「半」是約略之詞。有的是將新聞拼貼到某種吸引人的背景故事中，而長篇講述其故事細節。這些細節是報刊所不可能容納的。其實一直到近代，這種作風依然存在，在李家瑞《中國俗曲總目稿》中有大量與時事有關的戲曲，它們每每帶有「半新聞」或「拼貼」的性質。「半新聞」中當然有許多假新聞的成分夾雜其間。

以上略述明清時期媒體與輿論社會訊息傳播媒體的轉變，並提出幾點個人的看法：

第一、訊息的傳播往往比我們想像的快。明代中期以後輿論的傳播，不管是透過哪一種方式：如透過謠言、透過流言、透過街談巷語、透過書本、揭帖、邸抄、小報等等，傳播的速度和幅度，都比想像的要快，而且影響範圍很大。我原來以為這類傳播不會太快，但是比如說清雍正年間發生的呂留良（1629-1683）案，案發沒多久，日本、朝鮮就都有消息流傳。我看了大量的朝鮮《燕行錄》和日本通信使的資料之後，比較敢確定像這一類的傳播，倘若拿幾個事件作為定點來研究，便可以勾勒出它們的傳播速度與傳播幅度。

第二、訊息是人們賴以生存的重要東西，是人們賴以瞭解社會狀況並作決定與行為的一種依據。訊息是需要被知道的，人們需要知道大家在做什麼，我應該做什麼，大家可能是怎麼反應這件事情。訊息、消息跟輿論也是調動與影響政府官員、社會行為的一個最重要元素。訊息對一個社會來講，就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riedrich Hayek, 1899-1992）所談的「價格」（price）。他談到價格是調動市場的重要因素，使得大家都不需要依賴上面的規劃與指揮，就可以進行各式各樣的交易行為。

訊息，包括謠言在內，是群眾賴以生存的必要的東西。如明末北京已經失陷了，各地的官員與群眾要做什麼事情來因應？趕快躲起來或是反擊？在生活中如果沒有各式各樣的消息，人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事情。晚明祁彪佳（1602-1645）《祁忠敏公日記》中有一段講，如果看不到邸抄，一切只能向壁虛造。這也反映出很多人、特別是政府官員，依賴各種訊息來連結社群與對國家政治的想像並行動。

制衡、監督始終是輿論的重要作用，中國官僚體制中，監察系統有很強大的制衡作用。《三垣筆記》中記載，萬曆年間有一個官員在外犯事被御史追查，躲進宮中，要萬歲爺救他。萬曆回答說：「我怕御史」，可見監察權的制衡力量之一斑。明代徐日久（1574-1638）在其《真率先生學譜》中就說，要能不看邸抄，才能大膽辦事，可見制衡、監督、批評、揭露的作用始終是在的。

最後，我想強調一點。比利時學者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在復旦大學的一個演講〈18世紀進入全球公共領域的中國《邸報》〉中提到，清代中期有法國傳教士將邸報譯成法文，當時法國

輿論認為相對於西方的報紙，邸報查證嚴謹，消息可靠。邸報中有關《四庫全書》的報導甚至曾經引起法國國王的注意，並法國外務大臣表示希望訂購一套《四庫全書》，這一方面的研究體現了十八世紀跨國界輿論的情況。

以戲劇、小說傳播時事的傳統到近代也沒有消失。把正在發生的時事，在很短的時間內演為戲曲、寫成小說的情形非常多，值得進一步注意，但我畢竟不是這方面的學者，所以只能從輿論的角度略為一提。

辛亥革命以前，不少戲劇社已經將立憲派與革命派的宣傳融入劇情之中。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1866-1925）與袁世凱（1859-1916）之間的故事多次被搬上舞臺，孫中山為劉成禺（1873-1952）《洪憲紀事詩》所寫的序辭中說，當他聽到袁世凱編演辱罵他的戲時，亦不禁啞然。晚清有很多這種傳播時事的戲劇，他們的內容真假相互滲透，不能全信。很多時事劇都是以描寫戰爭、革命的英雄為題材，如談秋瑾（1875-1907）慷慨就義的時事劇至少有兩部，它們都是在秋瑾項上人頭被砍下來不久後就完成了創作。除了英雄，晚清時事小說也有很多是以新聞報導的形式來誹謗對手，如晚清黃世仲（1872-1912）的《大馬扁》就是講康有為（1858-1927）如何竊取廖平（1852-1932）經學考證的著作等。

在以下的討論中，我要討論晚清以來以新式報刊為主所形塑的新輿論社會，在第一個段落討論中，我將討論近代新式報刊所發展出來的種種特質：它們如何改變傳統輿論載體的運作邏輯，帶來一個不一樣的輿論社會。譬如由官方到民間、論政管道的多元化、由下而上的輿論格局等，以及五四之後，年輕學生與地方社會如何成



為新的輿論「發動機」。在第二個段落中，我主要是想反思新媒體對於近百年社會的意涵，尤其是從思想史的角度出發，看新的輿論平台與近代掀天揭地的思想變動的關係，譬如媒體與國民「思想水位」的變化，以及所謂「國民政治思想」型態的形成等。

二

同治以後，新式報刊大增、印量又大，逐漸進入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所說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一印幾萬份，到處可以看到同樣一份報紙，形成一種虛擬的，空洞的一體感。很多大官要員發表告示的時候，根本也不透過原來的管道，直接在《申報》上就發表了。周作人（1885-1967）在民初有一篇文章曾評論：小時候聽人家講，《申報》沒有登過的不算；要《申報》登過了才算數，所以《申報》已經跟朝廷的上諭地位差不多了，可見這個管道變得多元化了。

另一個特質是「規模」的問題。《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013年118號的主題是歷史中「規模」的問題（How Sizes Matters: The Question of Scale in History）。我個人也覺得「規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當一個人的獨白透過報刊的傳布而變成百萬人腦中的思想時，其性質是不一樣的。所謂「量變」產生「質變」，規模的大小也對事物的性質產生改變。一個訊息有沒有公開化，與它的傳播量大小，其性質是不同的。以前邸報基本上屬於官報，民間所辦的新式報刊，從同治年間開始出現，雖然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它們基本上是以商業為主的行為，辦報甚至

常被視為不正常的行為。晚清大僚左宗棠（1812-1885）等經常斥責報紙，且為當時人所認同，但是無論如何，新式報刊的發展之勢沛然莫之能禦。

在木刻版的時代，一本書往往只刷印幾十部，有些家刻本甚至一次刷印不到十部（當然刻板是保存著的，可以隨時再刷）。邸報的發行數量與讀者身分的限制也使得它與近代「印刷資本主義」時代的規模相差甚遠。晚清以後，一些新的刊物有萬份的銷量。其中有些報刊以特定地域為主，如《京話日報》是以北京市民為主要讀者的時事性政治報刊，其影響較密集、力道較大。依據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的統計，辛亥革命之後全國報紙銷量有四千二百萬份，這不是明代全國邸報近一萬份所能比擬的。五四之後，青年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便達到了四百多種，這些刊物的銷量雖然不能高估，但正如《沈從文晚年口述》中說：「當時這些刊物啊，《語絲》、《莽原》、《京報》副刊……出版也就是千把份，但是它的影響是全國的。」因為「規模」的變化，有一些原來只在當地或小範圍流傳的訊息，一經報刊刊出，每每由在地方上的「鄉評」變為全國舞台上的「國論」。

新報刊逐漸由「在野有識者」擔當，這與過去邸報基本上由上而下的輿論格局有所不同。雖然《大清報律》從1908年開始已經存在，從晚清到民初封禁報刊的案子時有所聞，但大量新式報刊的出現，顯示了一個重大轉變已經悄悄發生。由「上」而「下」的等級（hierarchical）式輿論，逐漸讓位給由「下」而「上」或是「下」不再動輒受制於官方權威的轉變。

新媒體輿論出現，社會精英產生的方式也不一樣了；以前的社

會精英主要都還來自科考，像爬階梯一樣往上升，清季以來的精英則常常是從報刊上來。許多人可以由作為報刊的負責人，作為輿論的旗手，成為新的社會精英。「言論界的驕子」們挾其文筆，往往幾篇文章便可以歆動天下，一代又一代的驕子，無不靠新報刊而起。李劍農（1880-196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中說，近代思想界有三個時代，領導人分別為變法時期的康有為、梁啟超，革命時期的孫中山，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胡適。這三代領導人，何人不是從言論界而來？葉聖陶（1894-1988）日記中便說：「今日之眾英雄皆報紙之生產兒」，辛亥革命前後湖北報人朱峙三（1886-1967）的日記中就描寫了不少這類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媒體「訴求」的方向也發生改變，以前的「訴求」是向官方，最好要上達天聽，要上萬言書，但在報刊時代，又增加上了一條管道。孫中山準備開始革命前，曾向李鴻章（1823-1901）上萬言書，同時也刊在《萬國公報》上，標題為「上李傅相書——廣東香山來稿」。陸乃翔在《南海先生傳》中說：「是時絕無布衣諸生上書者」，他第一次上書，即未取得同鄉京官同意，故未能代遞。但在新式報刊發達之後，只要往報紙上一登，就等於上書了。從此之後，論政不必要再去給衙門遞一封信，投遞報紙就是一個很不錯的渠道。當時很多人在報刊上發表電報以表示對於時局的立場（「電報戰」），譬如章太炎（1869-1936），時人便說他的一封電報抵得上一萬個人的軍隊。不必像清朝道光年間的湯鵬（1801-1844），到處拉人來看他論政的書——《浮邱子》。湯氏就是希望說服京官，考慮接受他的政見。新式報刊出現後，論政的形式全變了，變成是公共的。如果湯鵬活到晚

清，他只消把《浮邱子》刊登在大報上即可得到相近的效果。很值得注意的是，不但言論的管道私人化、多元化，晚清以來，各省大官還每每擷取報紙中的言論上奏，形成了一種「反客為主」的態勢。

透過新式報刊，也形成了一個化「私」為「公」的過程。如 Roger Chartier 的《法國大革命的文化根源》中提到，在法國舊王權的後期，隨著公共領域的興起，審理法律案件有一個由「私」到「公」的過程，由私下傳閱的信函（letter）到變成供大眾參閱並表示意見的備忘錄（memo）的過程。從晚清官府運作的形式看，也有一種將衙門的政策公開到報刊上並接受各界意見的變化。不管是案件、政策，新媒體使得互不相識的讀者，擺脫私人的關係，對官方政策形成自己的判斷。知識的交換與切磋也脫離了傳統學者那種以私人信件之間的抄傳為主的發表方式，變成以學報或刊物為公開發表園地的型式。

另一方面，社會精英要說服的對象慢慢地轉向讀者、市場，由上而下的「縱向」關係轉變為「橫向」的。所形成的網絡是「非親緣性的」（impersonalize），是由市場、讀者來形成的。當言論、輿論、新聞變成一個新的武器時，社會由縱向的「ladder of success」變成橫向的。言論有沒有價值，也不再總是由上官來決定，而是由市場、讀者，由訂戶來決定，這個情形一直到今天都還沒什麼改變。

晚清以後，輿論社會產生了一種我稱為的「夥伴效應」。南美洲 Jenaro Prieto Letelier（1889-1946）寫的《合夥人》（*El Socio*），裡面講住在南美洲的某個人因為不為大家所重視，他就

虛擬了一個合夥人，說自己在英國有一個合夥人，每天藉著假合夥人的名譽做各種事、發表各種意見，弄得風生水起。最後人家要求那個合夥人出現，他只好安排一場假的決鬥，把他的合夥人槍殺了，並對公眾說他把合夥人打死了，此後不再受這個合夥人糾纏。其實根本就沒有這個人，是他為了提高身分、躲避事情責任等等所捏造的一個虛擬人物。而晚清新式報刊宣揚新輿論、新思想的時候，每個訂報紙的人就像看不見的匿名合夥人。很多跟你讀同一份《時務報》的人，很可能是跟你的看法相近的「合夥人」，而且決不決定要訂這份報，等於就是選擇要不要這個「合夥人」。這個「合夥人」常時來訪，所以它們等於是家庭或地方社會中有主體的實際參與者。匿名的「合夥人」可能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所以史量才（1880-1934）說蔣介石（1887-1975）有五十萬軍隊，我有五十萬讀者。

新「文人群體」的出現當然也與新報刊有關。既有了發表園地，通常也有稿費可維持生活，新式文人固可以靠報刊舒展拳腳、維持生計，不少考不上科舉的舊時代文人，或者原來功名很低的舊文人，也可能轉變成報刊的作者。有一本書叫《稿酬怎樣攪動文壇：市場經濟與中國近現代文學》（魯湘元著），說有些名作家靠著在報紙上寫文章，月得三四百元。當時北京最有名的教授，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陳寅恪（1890-1969）先生，也從史語所和清華大學共得到四百元。

新報刊媒體的出現，使得輿論社會的主持人身分大變，「寒酸之人」可以藉著發表文章，對富有或有權力的人指指點點，如朱峙三在日記中引蘇松太道袁樹勳之折說：「現又有人創設《國民日日

報》……該報執事人等，多半寒酸出身，甘於為非，擾害大局」。身分組成的變化也導致「舊輿論」與「新輿論」的更迭。甲午之前，「舊輿論」的中心為科舉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他們的輿論特點是「以志節自負，廉介自許，對於中國傳統之政教根本、治術精華了解較深，思想教養，亦師法前哲，自有其風采境界，為士林所宗奉，在全國有極大之潛勢力」（石泉語）。甲午之後，中下層的不滿士人挾持著報刊的力量發表「新輿論」，取代了為科舉正途出身的士大夫所壟斷的「舊輿論」。

在新的輿論社會中，主編往往是關鍵人物，正如葉聖陶日記中所說：「（報紙）大抵各依其主見以為勝負」，主編比較關心銷量，注意讀者的意向，故往往需要就「下」，要能觸動一般百姓關心之點。而且每每由私下口頭談論化為報紙文章，由「私議」成為「公論」，往往幾篇讀者投書，就可以改變政府的一個政策。許多原來是官員之間溝通、商討即可決定的事，轉而需要刊登在報刊雜誌上接受讀者的檢視、公評。多元化當然是新輿論社會最大的特色，但我們也應注意到，同時也可能因為新報刊的強大力量而消弭了地方上原本多元的、歧異的（尤其是保守派）的聲音。這種傾向，在語言、風俗等方面也表現得非常明顯。多元性與一致性總是同時發展著，當然兩者也經常處於互相競爭的狀態。

訊息所扮演的社會功能很廣，甚至決定一個人在社會上的階層與地位，譬如在過去，能看邸抄的是一個特定的階層。一般人如果真要瞭解新聞，就得聽人家講，看告示，或是透過看戲之類的方式，這裡面區分出了社會階層的高低。在報刊時代，可能因為是在共同的訊息系統下，而形成一種同志感。同時，是否有能力買報，

是不是有能力讀報？所讀的是新派或舊派的報刊，其實也在地方上或羣體內塑造出一定的高低身分之影響。

從晚清的《時務報》開始，新傳播媒介即已進入許多城市、鄉村社會，這個情況在五四前後有了一些變化。胡適（1891-1962）在新文化運動之後，曾寫了“Intellectual China in 1919”說：「突然間，在地方出現大量的刊物，它們形成地方教育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小小的地方社會中，向來都是仰賴大都市提供知識的，它們有史以來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的輿論社會。」胡適很敏銳地觀察到新文化運動前後，連中學生也開始發行刊物，小小的地方社會也發行自己的報刊，形成一個輿論社會。我們可以從五四時期的各種刊物看出一個等級關係，在北京老師一輩辦《新青年》，學生一輩辦《新潮》，然後就一級一級下來，湖南的毛澤東（1893-1976）就辦《湘江評論》，還有難以數計的地方小刊物。《新潮》的很多想法、觀念就沿襲他們老師的《新青年》，地方上的刊物則每每承襲北京的《新青年》或《新潮》，湖南省學生聯合會的刊物《湘江評論》便是一個例子（毛澤東在該刊上發表了41篇文章）。它使得北京《新青年》、《新潮》的言論可以傳達到湖南士子圈中，也使得在地青年的議論，可以介入當時全國青年的輿論界。其他的例子非常之多，從《五四時期的社團》、《五四時期期刊介紹》中可以看到。小地方的青年報刊形成自己的輿論社會，這是前所未見的巨大變化。

從五四學生羅章龍的自傳《逐臣自述——羅章龍回憶統稿》中，紀錄了許多激烈思潮與新式刊物交織的歷史，沒有這些雨後春筍般的新刊物，新思潮不過是個人的囁語。而且各種事件是否「上

報」，意義亦大有不同。「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立是近代思想、政治史上最關鍵的事件之一，依據當時最直接參與的羅章龍的回憶，這個團體最初是秘密的。「秘密」或「公開」有重要的差別，而邁向「公開」有兩個步驟，一個是得到北大校方正式承認為學生社團，另一個是在《北大日刊》上發布成立消息。為了後者，他們花了很大力氣說服蔡元培校長，最後終於得到他的首肯。在羅章龍的回憶錄中說，蔡元培決定同意「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立，使得許多人非常驚訝，「他們說今後學校不得太平了。」北大學生社團能否在《北大日刊》上發布消息，顯然代表一種重要的意義。五四遊行當天，《北大日刊》即因校方的種種顧慮而未予報導。所以有報導與沒有報導是有肯認程度及公開度的差異，這也使我們回想起1986年9月28日，當民進黨在圓山飯店宣布成立時，當時主要媒體都未報導，只有《中國時報》的余紀忠先生決定刊布，這個消息一旦為公眾所周知，也就不可能由官方任意遮掩或壓制了。這說明「公開度」——訴諸廣大讀者的認知，與事件不為公眾所知是兩種不同的狀態。古代官職中「知縣」的「知」，或王陽明「良知」的「知」，有人認為這裡的「知」不只是「知」道，同時也有「管」的意思（徐梵澄《陸王學述》），對訊息的「知」本身也同時有「知」與「管」兩層意思。

由前面的討論可以知道，不管戊戌、辛亥、五四乃至共產運動的崛起，都與新式報刊這個強大的平台有關。在這幾個重大的政治與文化革命的過程中，官方或保守派往往要比較晚才認識到「言論」的力量，而且官方報刊數量很低，保守言論也往往不足以吸引大部分青年，所以即使清末官方曾在這方面力圖振作，但成效有

限，因此有人甚至說大清王朝亡于報刊手中。在新派陣營中也不是人人都很快認識到新輿論的巨大力量，孫中山在晚清辦了《民報》等刊物宣揚革命，但他要到五四運動之後才充分認識到新傳播媒體大規模且有系統的言論的無比重要性，發現「宣傳」、「思想」、「青年」三位一體的力量。在孫中山〈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中，說：「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抒發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攔其鋒。」辦成了幾個重要的刊物與出版單位。李劍農說：「以前的宣傳不過是領袖個人的文章或講演之宣傳，此後的宣傳，乃為大規模、有系統、有組織的宣傳。中國國民黨從此漸漸地與國民發生關係了。」

三

在上述的討論之後，我想提出幾點反思。第一，理想上所有新聞都可以被刊出，《紐約時報》1896年以來的信條便是：「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但事實上所有的報導都只是實際發生事情的一部分，誰有權力決定要報導什麼，本身便是一個大問題，因此輿論界中往往有不正常的偏向或傾斜。在這樣的挑戰之下，鼓勵優質媒體與言論作為社會輿論的領導力量一事就變得刻不容緩了。我們在前面多是強調新報刊正面的功能，但是它的負面性質也應是被談論的。首先是報刊經常專橫無理地攻擊或塑造議題，新報刊的覆

蓋度及訊息的強度，強而有力地形塑社會，變得愈來愈不能容忍多元的聲音。報刊愈來愈被讀者、市場及商業利益所決定，哈伯瑪斯在《公共領域的轉變》中所憂慮的商業邏輯的介入，也成了一個無可逃避的事實。

第二，我個人以為，近代中國出現一些「獨立領域」（independent sphere），包括在帝國主義侵略下形成的「租界」。租界為王朝權力所不及之處，因此出現了許多在王朝統治下所不可能操控的發展，有時甚至保障了一個獨立空間。新報刊亦形成了一個「獨立領域」，為官方意志所難以插手，像《蘇報》、《亞東時報》詆毀清政府，無所顧忌。在《蘇報》案中，由於負責審理的是租界的工部局，被告是章太炎與鄒容（1885-1905），而控方居然是大清政府。在社會新聞方面，如光緒年間，發生在北京的婦女春阿氏被誣謀殺親夫，在刑部屈打成招的案子。事發之後，《京話日報》攻擊刑部虐待犯人，同時發表春阿氏無罪的調查資料以及讀者投書，力挽刑部的決議。春阿氏的故事很快被寫成風行的時事小說《春阿氏謀夫案》。還有那王府活埋人的新聞，《京話日報》也拒絕刊登宗人府送來的付費更正新聞。這兩則故事是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及其他書中所常稱引的，說明在新式報刊中存在著獨立於官方的「獨立領域」。以前「public」基本上是由政府所代表的，現在「public」同時也可以是由公眾輿論所代表的。雖然這種例子數目不能太過誇大，但不能否認它們成為一種風氣，甚至形成或斷或續的傳統。

但「獨立領域」是不是就是「公共領域」？哈伯瑪斯認為形成「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要件是「public use of reason」



（對理性的公共使用）。近代的「輿論社會」，顯然還不完全談得上「public use of reason」。有的充滿亂七八糟、威脅利誘，代表不同利益的新聞，這些不一定完全符合「公共領域」的標準。但是近代新報刊（不少仍以迎合官方為主，包天笑（1876-1973）的《鈞影樓回憶錄》中即充滿這方面的記載）也形成了「獨立領域」，有許多輿論非官方所能左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

第三，新式報刊與思想解放及思想世俗化的關係。近代報刊具有種種特質：由「下」而「上」的、民間主導的，尤其是以讀者（訂戶）的趨向作為決定報刊言論及報導走向的重要依據，它們使得思想言論世界產生莫大的變化，一方面是有多元而不太受牽制的管道可以發表各種意見，使得儒家的正統思維或官方加諸人民的束縛逐步褪色，讓位給由報刊讀者們所喜聞樂見的言論與訊息。有時這使得報紙性質轉向趣味化、低俗化，但讀者透過市場機制也有時將報刊引向批評時政之路。譬如清末《民呼報》在於右任（1879-1964）主持時專以攻擊官場為主，後來於右任離開交給別人主持時，因為論調改變，《民呼日報》的銷量即一落千丈。無論如何，此後的常態是「市場」決定言論的性質與方向。如果能得到「市場」的響應，則官方的支持、富人的贊助便不重要了，其言論或報導也就不再受侷限。這也就是梅光迪（1890-1945）在〈評提倡新文化者〉一文中所說的「功名之權操於群眾」，但是群眾可以趨善也可以就惡，無論如何，新媒體與近代思想界好的或不幸的重大變動是密切相關的。

第四，我想談近代的新式報刊逐步改變了一般人「思想水位」的情形。過去幾十年，從「書籍史」的角度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文化

根源，是西方史學界的一個熱門題目，對於這個問題，有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Robert Darton一派強調特定啟蒙書籍對革命行動的啟發作用，但Roger Chartier這一邊似乎認為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他說有些貴族、保皇黨也在閱讀啟蒙書籍。在這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之外，我想再提出「思想水位」說，即不同時代思想水位的升降，並不全然與身份差別有關，而且往往在人們不自知的情況下形成。它們與特定書籍的影響有關，但在報刊興盛的時代，人們未必要讀某些思想典籍才能吸收並改變自己的思想，報刊雜誌中時不時一鱗半爪的披露，便可以使讀者們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逐漸形成出某種共同的「思想水位」，以致於某些原先在不同身分看來是不共戴天的觀點，慢慢成為即使仍然互相敵對的人群的常識或共識。

大體而言，近代以前的報刊罕言政事，對國家大事及官場中人往往不敢妄加論議。在甲午之前，報刊基本上以報導性質為主——即使報導社會現象，通常也是報導而不評論。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說，當時「全國上下皆無政治思想」，此話當然只是概括性的，但也反映了在新式報刊盛行之前一般人民的思想狀態。甲午之後的報刊開始出現「政論」一類的文章，「短評」則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它們要評論某些事物、要宣揚某種政治觀念，新式報刊化「點」為「面」，把政治觀念傳布各地，成為共享的思維。改變大眾「思想水位」的不僅是報刊，但清末以來，席捲全國的思想風潮接二連三地來，對「思想水位」起改變作用的很重要的因素之一便是星羅棋布的新式報刊。它們的傳布「規模」使得思想水位一時俱升，譬如因為有梁啟超的《時務報》等，使得「自由」、「平等」、「熱誠」、「冒險」、「毅力」、「自治」、「公德」、



「私德」等，成為人人耳熟能詳的思想觀念。這種傳布的方式與規模是前所未有的。

思想擴散的作用似乎以新雜誌為最。呂思勉（1884-1957）在〈三十年來之出版界〉中說：「三十年來動撼社會之力，必推雜誌為最巨。凡風氣將轉跡時，必有一兩種雜誌為之唱率；而是時變動之方向，即惟此一二種雜誌之馬首是瞻。」晚清以來許多以「報」為名的，其實是雜誌，像《時務報》每十天一冊，每冊大約二十幾頁，也等於是雜誌了。至於民初的《新青年》、《新潮》等也都是激起時代思想風潮的雜誌。

許多人在抗拒的過程中，慢慢地跟著大眾升到某個思想水位的；不知道什麼時候，原先那些被視為洪水猛獸的觀念慢慢地成為語言中的前綴詞，許多重要文本中的觀念，像奶粉泡成牛奶，喝的人都看不見原先的粉末，原先的「風波」後來變成了「風氣」。許多原來拒談變化的人，隨著水位逐漸上升，變成不反對或甚至是支持。

依據舒新城的回憶錄，在他清末所讀的高等小學閱報室中，有《時報》、《新民叢報》、《國粹學報》、《安徽俗話報》及《猛回頭》、《黃帝魂》、《中國魂》、《皇朝經世文編》、《西學叢書》、《皇朝蓄艾文編》、《時務通考》等等，這些書刊中有許多是提倡種族革命的，卻公然在閱報室中陳列，對讀者思想水位之提升作用可想而知。再以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例，許多人便是從各種新期刊發現一個新世界，並由原先的抗拒、反對到成為忠誠的信徒。如遠在福建的鄭超麟（1901-1998）及他身邊的一群年輕人，原先痛罵陳獨秀（1897-1942），可是經過《新青年》洗禮之後，留法

的學生中，同行三十幾個福建學生，半年、一年後幾乎全寫白話文，鼓吹新思潮。

第五，從明清以來到近代，隱隱然可以看到一種「必要的緊張」。一方面是官方、法律所代表的是非與標準。另一方面是民間以時事劇、時事小說、揭帖、新聞等所表現的是非與標準——說實在的，它們也不總是站在對的一方，但這兩種是非與標準每每形成「必要的緊張」。而在近代新式報刊大興之後，這種「緊張」更為犀利，對抗的力道也更強大。當然，「公」的、「官」的不一定總是錯的，「私」的、「民」的也不一定總是對的，但是這種「必要的緊張」，也是近世輿論社會的一個特色。

第六，自古以來都有輿論，但它們到底是埋藏在各種社會關係中，還是成為諸社會關係中的主體，這兩者之間有層次性的差別。傳統輿論基本上只是在諸社會關係下的一個脈絡，在新式報刊的時代，它逐漸成為一個主體，使得人們的日用人生被輿論深深捲入。像英國前首相John Major，要等到清晨看到報紙之後才能入睡，這固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由此可以想見輿論成為一個主體，使得日用人生被深深捲入的情形。一般人雖然不可能像John Major那樣，但是相對於古人，近代人想像人生與社會的方式是徹底改變了，個人被緊緊地包裹在層層的訊息網與社會網中。

第七，從前面的討論中，我們看到近世輿論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傳統政府管制模式，一種是近代報刊「自發」的模式，而不管任何時候政府或官僚多是傾向前者。包天笑回憶錄中說：「那時的清政府，也痛恨着新聞記者，稱之為『斯文敗類』，見之於上諭奏摺」、政府也不重視新聞傳播於民間，有時還諱莫如深。此處所描



述的政府憎恨輿論的情況，毋寧是一種常態，而且當政府擁有的力量愈強，就愈不容許訊息自由的流通。但是在近代新式報刊的勢力大張，訊息相對自由流通的時代，管制的力量通常是有限的。在這個「自發」的模式中，各種訊息或「假消息」充斥，但也可能透露了正在發展而不為人所知的事情。它們一開始不為人注意，可能不久即轉為大事，甚至變成危機，這就好像一個人健康出了某種問題，而發燒正是一種示警。人們可以自然而然地因應這些四面八方的零碎訊息，並採取各式各樣的行動，這是海耶克所謂「自發的秩序」。就像一群玩拼字的小孩，七嘴八舌地用他們僅有的字彙，像接力賽般地，一方面試誤，一方面嘗試著把字拼齊。如果訊息是被管制的，一定要等到最高權力者批准才可以發布，那麼便可能壓制了「訊息」作為「吹哨者」的正面作用，就像一個有病的身體卻不准它發燒一樣。在我作完「余紀忠講座」，並著手改寫這個演講稿時，發生了新冠肺炎，而從2019年末的新冠肺炎擴散以致不可收拾的例子中，我們便看到管制輿論模式的重大問題。

太過自由、太過多元的訊息確實非常惱人，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訊息」是調動社會行動的看不見的手，散在各地的人經常是靠著訊息，而不是靠著指令或計劃來因應事務的。在新冠肺炎傳布的最開始，李文亮等所謂「造謠八君子」，便已在2019年12月30日在微信發出消息，但遭到公安警告，並在「訓誡書」上填寫「能」、「明白」。後來，武漢市長周先旺也曾公開說，他們很早便將疫情上報，但是沒有上面的批准是不能發佈的。錢鋼在〈病毒肆虐時，黨媒在忙什麼〉一文中說：「2020年1月1日到2020年1月20日，整整20天，人民日報對武漢疫情只字未提。……這20個《人

民日報》頭版，的確是執行「兩個維護」的典範。20天，有19個頭版頭條和習近平有關。……20個頭版上，有66篇的標題有「習近平」三字，一直到1月21日，《人民日報》才出現習近平對疫情的指示。」地方黨報對疫情雖略有披露，但情形幾乎一樣。這個危機透露了我在前面所說的，管制型輿論模式隱涵重大危險，也顯示了自發型輿論模式雖然五花八門、真假參半，可是當它不是猖獗無度時，「訊息」本身可以調動分散各地的人採取各自有利的行動，而對多數人有利的往往便是對社會有益的。新冠肺炎的擴散，正好突出兩種輿論模式的反差。

如果再從「規模」這個角度看，由書本到報刊再到網路，其規模呈現三個階段的跳躍。不但「規模」大變，輿論形成的速度及輿論壓力匯積的速度更是前所未見。以前可以有幾天、幾週甚至是幾個月的時間來回應輿論，在網路時代則壓縮為幾小時，甚至是幾分鐘。

網路時代是一個「自傳播」的時代，人人都是主編，人人手上都有一部SNG車，人人都可以透過Twitter、Facebook等方式發布新聞。套用聖經〈士師記〉的話：「In those days there was no King in Israel」（在那些日子裡，以色列沒有國王），下一句是「Every man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每個人任性而行，各做各的）。在這樣的時代裡，偏頗、未經查證的「假新聞」充斥，而且每個人都可以任意給別人「來一段」（這是清末民初新報刊盛行時，無聊報人威脅別人的話），這個時候，「制衡」再度成為一個關鍵詞：不只是輿論制衡政府、制衡社會，輿論本身還需要別的制衡。我們期待不管是以司法手段、新聞查核，網路自清或是其他的



方式，社會上能形成豐沛的正向輿論，使得輿論世界能「潦水盡而寒潭清」。

最後我想提到，在近代知識份子辦報傳統中，余紀忠先生無疑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余紀忠先生曾說：「我是在民國三十八年國家遭逢重大變故之際深受感觸而決定改變生活，不計後果要辦一份反映時代變遷，針砭社會弊病，策應中國未來的報紙。」三十九年秋，韓戰爆發，物價一日數易，余紀忠先生開辦《徵信新聞》，後來則發展成規模龐大的《中國時報》系。他說：「辦報最高的原則，就是要在任何關鍵時刻發揮無私無懼的報人本色，為時代作見證，為歷史留紀錄。」在將近五十年間，余先生所創辦的報紙與刊物正是報人本色、轉動台灣輿論的重大推手，我個人謹以上述的演講向他表示追念之意。

【對談】

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

王汎森·呂文翠



呂文翠：非常感謝王院士精彩的演講，他提到明末社會輿論的假新聞、假議題等，似乎跟台灣當下的社會情境有驚人的相似，帶領我們從晚明到清末民初，透過了解過往歷史與輿論社會的形成與轉變，能對當下的社會文化現象進行比較深刻的思考。

因為時間的關係，接下來我想讓臺下的與會嘉賓趁此難得機會跟王院士交流、提問，現在可以開放兩個問題，有任何的想要向王院士請益或對話的，都可以在這個時候提出來。

如果要提問題的話，請先表明身分，自我介紹一下。好，這一位同學。

華中師範大學交換生馬同學：王院士你好，我是來自華中師範大學的交換生，第一個問題就是明末的時候，東林黨對於政府所有的政策都會提出抗議，背後是不是明初的一個延續？第二個問題是，五四運動為什麼發展那麼快，背後是否有輿論推手？第三個問題就是在科舉制度廢除以後，通過報紙、發文章之類的，社會輿論發揮的作用到底是怎樣？

王汎森：朱元璋是性格非常強烈的人，非常反對士大夫的習癖，非常反對浮華跟享受。所以他的軍人裡面只要有唱小曲的，一律重罰；掀褲腳踢毬子，用右腳踢砍掉右腳，用左腳踢砍掉左腳，而且他對科舉有一點不信任，所以他辦了很多學校。明代早期有好幾位宰相都是學校出身的，而不是科舉出身的。

晚明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時代，士人之間黨社之爭相當嚴重，輿論對官府的批評很厲害，形成了制衡，當然也是一種掣肘。它有好

處，但是對現實政治也有莫大的阻擾。為什麼清朝改變明代很多政策，凡涉及輿論，或是像巡按制度清朝就不要。我們看明代小說很多提到巡案，八府巡案，巡案官階是不高的，可是巡案就是能監督制衡地方大官，有時會造成風潮，所以清朝皇帝可能覺得巡案掣肘太厲害，有時引起士論動盪，影響官方辦事，所以廢掉它。

還有推官，明代有推官，清朝把它廢掉。明代推官很多有名的，晚明有名的清廉的好官被演成戲的，很多人的經歷都做過推官，清朝也不要。五四運動之後，人們看到輿論是一個大的力量，所以孫中山在五四運動後策略大變，孫中山事實上受五四運動的刺激很大。

從此國民黨開始知道輿論是一個重要的東西，光是靠拉攏軍閥是不夠的。幾個年輕學生，幾張報紙就可以讓軍閥屈服，這是孫中山以前沒有想到的。所以孫中山在五四運動以後，告國民黨海外同志書裡面講，我們此後要辦報紙辦雜誌，辦出版社。他原來以為政治的權力主要是槍，是武力。五四以後發現輿論力量最大，年輕人力量最大。我知道現在很多人要把軍閥或日本人扯進五四，認為他們在五四裡面有角色，但我還是認為他們即使有角色，也是邊緣性的，五四青年造成輿論的力量非常大。以羅家倫為例，他的女兒幫他整理羅家倫全集的補篇裡面有一些自述，其中有一部分內容可能在生前不敢發表，後來在補遺裡面。

在補遺裡面提到五四運動的時候，他們用了一筆錢印了多少的傳單，甚至請北京做饅頭的，在饅頭蓋上抵禦強權、宣揚公理之類的印記作為宣傳。宣傳可以蓋在饅頭上面，因為全北京市都要吃饅頭。

「橫向社會」的這個問題，事實上1905年廢科舉之前，新式的報刊已經成為中下層的科名者很重要的出路。1905年廢科舉這件事情當然是驚天動地，不得了，哭天搶地的事情。因為這個東西從隋朝末年一直流行到清朝，1905年，都是選拔官員的很重要的途徑，不是唯一，但是很重要的途徑，突然廢掉。

可是我們仔細看當時，事實上1905年廢掉以前很多舉人，秀才就已經不走考科舉路，因為太難了。你看包天笑的回憶，他是當時非常有名的一個報人。他花很長的時間考舉人，從回憶錄看來他每一次都以為自己要中了，結果他還是沒有中，可見其困難。如果我沒有記錯，包天笑一生最後就是秀才，後來投身在報紙，成為民國報紙非常重要的人物。像這種人物在當時已經很多了，他已經不走科舉功名那一條路，而是走另一個出路——新式報刊。因此你提到社會流動，當時有一種向別的領域流動，橫向的流動，而不是像以前向上的功名的流動。而且新的菁英，每每是靠橫向的聯絡、組織、動員等工作而成為菁英，不像舊科舉是縱向的，訴求考官的欣賞式的成功方式，這也是「橫向社會」的另一意思，這個變化是非常大的。

呂文翠：因為這位同學就問了三個問題，所以我們王院士已經回答了三個問題，那最後再一位同學，好，中間這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交換生王同學：院士你好，我是來自南京信息工程大學的交換生，我的問題會是你剛剛提到說輿論的多元化最終也會……到一定程度也會變成輿論的一元化，所以我想問一下這樣的一元化是怎麼樣的一種情況，謝謝。

王汎森：一元化跟多元化一直同時在進行，而且是互相競合的狀態，就是說它一開始多元化，打破了原來一元的、官方的壟斷，或者是打破了由權威來決定某種品味或是某種好壞的標準，現在有各種報紙、報刊了，它可以提出另外一套來抗衡原先一元的格局，形成多元化。明末清初有一本書叫《三垣筆記》，在後面有一則講到萬曆皇帝，有一天有一個太監在北京城外不知道做了什麼，結果御史要抓他，他躲進皇宮裡面，求萬曆說萬歲爺救我。萬曆跟他講：「我怕御史」，我沒辦法救你。連皇帝都怕御史，為什麼，御史有批評的力量。後來是媒體，新式報刊，所以當新式報刊強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在過去那種以官方為主的一元格局之外，會有多元的力量產生。可是如果某些報刊讀者非常多、壟斷性強，它也會把多元的語言、意見變成一種語言，一種意見，文體也變成一種，晚清的新民叢報體，五四之後的思想、文學即都有趨於一元化的傾向。

你看新民叢報最盛的時候，舉國的文人都模仿新民叢報體，原來的駢文、桐城文派等等，一時之間就不在主流的位置上。以前各地有各地的不同看法，五四運動以後，白話報刊一出來，白話就逐漸變成一元的、唯一的東西。有寫文言文、駢文的，但是它們不成為主體了。強勢的新報刊也會把品味，政治意見等變成一元化。所以，多元化、一元化是同時一直在競合中的。這個是個大問題，那因為我個人不用電腦，所以我比較不熟悉這個世界。譬如剛才我請教呂教授，投影片背景模模糊糊的書法是從哪裡找來的，因為我自己都不記得為什麼會有那些字，後來她告訴我是從網路上找來的。網路是另外一個新的、強大的媒體。



呂文翠：是。

王汎森：網路裡面「鄉民」的意見，跟我們這一輩熟悉的那些平面媒體或電視所傳播的輿論好像又很不一樣了。這是一個全新的，非常新的世界。網路也可以變得非常一元化，本來一百種意見的，後來慢慢歸成兩種意見或一種意見。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但是已經超出我的能力了，謝謝。

呂文翠：好，我們今天時間已經到了，讓我們再次以熱烈掌聲謝謝王院士帶來精彩的演講。

【回應一】

輿論社會、國家性質與 未來危機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很感謝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與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蔣竹山教授邀約我對王汎森院士「余紀忠講座」〈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做一回應。

本文將近世輿論社會分為三個階段，晚明到清初以邸報為中心的「傳統輿論社會」，至晚清開始則為「新式輿論社會」，而新式輿論又分為以書籍、報刊為主的印刷媒體與網路時代。由此可見輿論社會的性質與「傳播載體」關係密切。在傳統時代，作者除了介紹邸報、小報、揭帖等媒體之外，還特別指出時事小說與時事劇等「半新聞色彩」載體，這兩者藉著傳播（真、假）訊息、思想與道德標準，形成官方訊息與民間觀點的「必要的緊張」，而發揮了制衡、監督的作用。

作者在後半段則主要討論報刊出現後所產生的巨大變化，而「帶來一個不一樣的輿論社會」。這些變化包括因印刷而導致訊息量的巨幅擴張，以及連帶產生質的變化，如「由官方到民間，論政管道的多元化、由下而上的輿論格局」。同時，以往輿論的制衡作用是訴諸官方，新式輿論社會則訴諸民間，而非官方所能完全左右，因而促成了「思想解放與思想世俗化」，出現了新的「思想水位」（意指時代的共識）。作者認為近代輿論社會形成了「獨立領域」，然此一獨立領域不一定符合哈伯瑪斯所謂的像西方那樣具有「對理性的公共使用」而形成的「公共領域」。

這主要因為中國新式輿論社會有不少隱憂，例如新聞從業者對出版訊息的選擇，這些選擇有一部分出於意識形態，一部分由於「商業邏輯」的介入。簡單地說「各種訊息或『假消息』充斥……一開始不為人注意，可能不久即轉為大事，甚至變成危機」。這種

情況在網路時代更為嚴重，最近冠狀肺炎的流傳初期大陸「管制型輿論模式」針對「李文亮事件」所採取圍堵措施即產生「不可收拾」的後果；相對來說「自發型的輿論模式」中讀者可在零碎訊息之中拼出一部分的真相，並能制衡國內外官方所發出的訊息。無論如何，在這兩類型的輿論社會之中，如何面對「媒體操控」與甄別真假新聞，並予以多元的制衡，是當前所面臨的嚴峻的挑戰。

以上大致為王汎森文之主旨。此文不僅宏觀地勾畫出晚明以來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而且作者徵引許多有趣、生動的歷史細節，以具體事例來說明時代的變化。

我讀完之後聯想到幾件事情。第一是中國輿論社會在晚明之前有長遠的背景。林語堂在1930年代所寫的*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6)，中譯本為《中國新聞輿論史：一部關於民意與專制鬥爭的歷史》可以補充我們對歷史背景的瞭解。此書以中國歷史上的*Press and Public Opinion*為題，以「民意與專制鬥爭」為主軸，描寫中國輿論的歷史。本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古代的社會輿論及其表達方式。林語堂也注意到最早的輿論批評形式是一些歌謠和韻文，包括一些小說和戲劇，它們朗朗上口、易於流傳，並且對統治階級抨擊的激烈程度是現代受審查的報刊所無法達到的。而在中國歷史上漢代的黨錮、宋代的太學生運動和明代的東林黨運動為三次高潮，代表輿論與統治階級之間的有組織的鬥爭。第二部分是近代的新聞業如何反映社會輿論。他談到報刊發行量的擴張、廣告的重要角色、對啟迪民智的作用、中外之比較，並反省報刊審查制度與新聞從業者的專業與操守等。他試圖從這樣的描述中尋找民意和權

力之間的關係，並探索新聞能在多大程度上表達民意。由於林語堂具有報刊發行的實務經驗，本書所述翔實生動，頗能補充王文的內容。

其次，我認為輿論社會的性質除了涉及「傳播載體」的演變，也與載體所在的政治體制、國家性質有密切的關係。這涉及「政治核心」的特點，以及政治核心與「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的關係（即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王文所討論的「輿論」是民間社會的重要部分。「政治核心」是席爾思（Edward Shils）與艾森斯坦（S. N. Eisenstadt）的觀念。這個觀念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政治活動的結構，以及輿論所扮演的角色。「政治核心」指一個國家最重要的領袖們或向心的精英分子，這樣一來，我們能用這些政治核心與民間社會的關係，將政治活動作一分類。如果這個關係多半偏向到民間社會的政治架構，就是「被民間社會控制的政治核心」，即自由民主體制，此種民間社會即哈伯瑪斯所說的「公共領域」；假如這個關係多半偏到國家最重要的領袖身上，這就是個「無限制的政治核心」（an uninhibited political center），如極權國家；如果民間社會與國家領袖平分秋色而有部分的制衡，就是「有限制的政治核心」（inhibited political center）。（這個部分請參考墨子刻，〈從約翰彌爾民主理論看台灣政治言論：民主是什麼——一個待研究的問題〉，《當代》，期24（臺北，1988），頁78-95；以及“The Western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History”收入*Civil Society: History and Possibili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04-231）這三種國家型態之下，輿論扮演不同的角色，這一分法或許可以更清楚地說明王文所說的「管制」與「自發」模

式。例如中華民國在民主化之前是「有限制的政治核心」，民主化之後的理想則是一個受民間社會控制的政治核心（這一個理想有沒有實現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至於中國大陸的政權則是「無限制的政治核心」，然而即使在理論上無限制，此一政府在許多非政治性議題上也常常受到一部分的輿論之影響。

這三種類型的政府在網路時代來臨之後都面臨「媒體操控」的問題。當然民主社會與極權體制之中媒體操控的手法與面臨的危機並不相同。

「無限制的政治核心」的問題是國家對媒體的全盤掌控，而權力毫無制衡的危險。中國大陸政府不准許谷歌、臉書、LINE、YOUTUBE進入大陸，而以微信、微博等取而代之，而且微信是與銀行支付系統結合，這些媒體都受官方管控。一旦朋友圈中有人發表不當言論（即「違反互聯網用戶公眾帳號信息服務管理規定」），輕則封鎖訊息、重則停號，連微信支付也不能用。此一懲罰不可謂不重。我的一位好友孫江教授今年初在微信發表〈即使明天重新開始，也不能原諒〉的一篇文章，提出「新冠疫難要求我們重溫啟蒙時代的訓誡：應該服從的是人的理性，而不是任何權威。不受監督的權力如一頭猛獸，真正的公權力應該是公民的公僕」。此文立刻就被封鎖、微信停號，而且作者遭到警告。這就是王文所謂「管制輿論模式的重大問題」，極權政府容不得一絲的評議。

當然中國大陸「無限制的政治核心」也有它的好處，即有效率。例如，有學者（如山東大學的貝淡寧教授在〈風向：中國抗疫模式是什麼？這個洋人說透了〉）認為中國對疫情控制比許多西方國家成功，主要即在於這一套有效的受儒家賢能政治影響的體制，



實現「國家力量自上而下的大規模動員」來遏止病毒的流行。相對來說，美式的民主選舉，當選的人有天下的責任，卻不願思考全世界與未來世代的利益。無論如何，國家效率、長遠利益與個人自由作為政治目標，孰輕孰重，仍有辯論的餘地。

臺灣桃園機場捷運的例子或許可以用來說明此一情境。桃基捷運花了十多年才建成，與大陸有效的交通建設形成明顯的對照。我有一次和四川大學的羅志田教授討論到這一件事。他指出無效固然不好（受各種因素限制），然而有效也有有效的問題。有效政府不受輿論限制而能大刀闊斧施政，但也能有效的「施暴」，而使社會付出慘痛的代價。這讓我想到波普（Karl Popper）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所說的，所有人都會犯錯，但是「偉大的人可能會犯偉大的錯誤」（Great men may make great mistakes）。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還有不少。

然而另一方面在民主、選舉的社會（即受民間社會控制的政治核心），也面臨媒體的政黨化（藍綠陣營分疆化界）與連帶產生「媒體操控」的問題。這一種操控在臺灣已經十分普遍，甚至到一個很細緻、專業的地步。有不少行銷、公關公司，只要雇主付錢，即可代為組織「網軍」，就特定議題進行操作。在〈誰帶風向：被金錢操弄的公共輿論戰爭〉一文中，作者指出「有錢，就有本事發動輿論的征戰」，而據云從課綱微調爭議到政黨下莊，都和某黨之操作有關。有一次我和陳文茜討論到這個問題，作為一位媒體寵兒，他手上有好幾個十分受到歡迎的節目，能表達意見，然而她卻對於「媒體操控」對臺灣輿論社會的影響感到非常悲觀與無力感。這一個問題是「自發型輿論社會」的嚴重危機。

其實韋伯與熊彼得早已提出的警告，民主從來就不是老百姓當自己的主人，而是被精英分子所控制的。在網軍的時代，這種控制已變得更加強烈、更加全面。換言之，誰能成功地影響風向、操控民意，誰就能影響選舉（或罷免）而決定誰是老百姓的主人。這樣看來輿論社會的動向，不只是歷史議題，而密切關乎人類之未來，如何因應這些危機值得吾人仔細思索與討論。

【回應二】

訊息傳播與大明興亡

王鴻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大明王朝延續三百多年，最後竟以流寇入京，皇帝上吊告終，如此結局，充滿戲劇性。帝國之傾覆究係何因，卻莫衷一是。亡國之君遺言「諸臣誤朕也」，或許令人同情，卻不無卸責之嫌。崇禎殊非任人擺佈者，孟森言其「置相如奕棋」，在位十七年中，用宰相至五十人、刑部易尚書十七人，兵部尚書兩人被誅，遭戮總督七人、巡撫十一人。可見皇帝乾綱獨斷卻搖擺不定，乃至一錯再錯。崇禎不昏不暴，卻非慎謀能斷，以致成了亡國之君。究其要因，訊息掌握不明，未能據以正確判斷，恐是關鍵所在。帝國晚期，訊息紛然雜呈，真真假假，有心人更刻意居間操弄。諸臣「誤」我或可解釋為：黨爭激烈情勢下，群臣各據立場，任意混淆皇帝視聽，使之陷身訊息迷霧中，終於覆舟其中。明之亡，亡於訊息混亂也。訊息操控，國運所繫也。

大明王朝之興衰，確實與訊息掌控息息相關。太祖建國初期，即將「漏泄軍情大事」、「造妖書妖言」列為死罪，可見其已深悉訊息掌控關乎國家興亡，也因此他更成立錦衣衛，賦與偵緝刑訊之責，大明特務統治自此發端。洪武末期雖下令裁撤錦衣衛，焚其刑具，然利用特務掌控訊息，以固君權，以維國安，既已肇端，終難斷絕，乃至越演越烈，後患無窮。朱棣發動靖難對抗朝廷，師出無名，兵力懸殊，卻得成功，訊息掌控實屬要因，皇帝近侍閹人竟成燕王耳目，制敵機先於大內。永樂時，復用錦衣衛查緝外，更設立東廠，由宦官統領。此後廠衛並行相制，成為訊息掌控與權力操作之機關要地。皇帝與群臣之爭鋒角力，率多發端於此。政治之明闇，幾如此隙光影之投射，而王朝之興亡，乃由此端緒牽連。

明英宗九歲即位，年少氣時為王振所惑，後竟御駕親征，兵敗

被俘，釋回後幽禁深宮，被嚴密監控，卻又在宦官與文武近臣的密謀下復辟。這場政變的成功頗令人困惑，談遷《國權》言：「于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奪門之謀，懵然不少聞，何貴本兵哉？」事後石亨曾向皇帝邀功，推舉參與復辟密謀者為錦衣衛指揮使，看來錦衣衛的情報系統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政變過程是一場諜報戰。而經歷劇變再掌大權時，天順帝已熟諳權術，更深悉情報操控的重要，《明史》言：「是時英宗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為耳目。」復位的皇帝特意掌控特務以監控群臣，尤其對石亨等人不斷擴張黨羽深感不滿，因而另用錦衣衛首領窺伺之，終而藉此將之剷除。大明王朝之權力運作自此明爭暗鬥相交作用，而特務暗中進行之情報搜羅，殺人於無形，更屬關鍵。訊息之鑰即權力之柄。

成化帝成長於父叔間權力變換的危疑中，少年即多歷權力風浪，在位時又遭逢令人疑懼的怪亂事件，居權力高峰卻時感不安。成化十二年時，京城內發生不明妖物出沒傷人的黑眚事件，首都騷動不安，恐懼甚至襲擊皇帝：「一日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懷恩按之，頃之乃定。」之後不久，又有妖人李子龍結交宮廷近侍，深入大內，游樂禁地。如此妖物妖人激使皇帝極度不安，因而「銳欲知外事」，乃任用寵信太監汪直為密探，以之掌控各種訊息。受命「出外詞察物議」的汪直亦確如特務樣態：「布衣小帽，乘驢騾往來京城內外，人不之知。直刺得外間隱事，以取信於上，上益委任。」情報搜羅深獲皇帝信任，皇帝因而為之設立西廠。西廠設立後，汪直更積極監控一切：「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鬪冒雞狗瑣事，輒置重

法，人情大擾。」（《明史·汪直傳》）另一方面，官員互相傳抄使知朝政的公文（即邸報原形），也被列為機密，禁止傳播。至此，宮廷與群臣，訊息傳播與政治輿論，勢成對立：皇帝用太監掌控並壟斷訊息，藉以專制獨裁；儒臣群體則對此表示反對，企求訊息流通，使得公開議政，形成輿論。

訊息傳播之管制或流通，至成化朝以來，明顯成為政治議題與立場選擇，時有爭議。然則，大勢所趨，訊息開放聲調日趨於盛，甚而有謂：「禁科抄之報，不使騰傳，一世盲聵，萬年長夜。」事實上，訊息的傳播也已禁不勝禁。明中期以後，邸報之編輯傳抄，越傳越廣，讀者群也不斷擴大，以致不在朝為官者，也多藉此以關心國事，以相互議論。朝廷之事確實成為天下之事，關心天下事之士人，積極參與訊息之流傳脈動，鼓動輿論，對當權者構成莫大壓力。政治的操作已經不只是決策裁斷，利用職權處理相關事務而已，如何面對或引導輿論更屬要務，此中訊息之流動方向是屬關鍵。另一方面，訊息的雜然紛呈，不乏有心人刻意操作，以致真假難辨，卻又難以管束。訊息四處流竄，影響人心，鼓動風潮，這都也成了施政上的莫大挑戰，許多政治紛擾也由此而起，甚至許多政治問題即出自訊息傳播，或由此滋長蔓延以致不可收拾。

明史言：「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此或不免責深武斷，然亦非無的放矢。萬曆時因國本問題，群臣分立成黨，而在此過程中，訊息傳播往往更使黨爭激烈化，如「妖書案」即以真假難辨的訊息，成為政治攻防的藉口。因政治紛爭而滋生疑議訊息，演成疑案，疑案又滋生更多的政治紛爭，惡性循環下，黨爭糾纏越結越緊。同時，這些爭議都見諸邸報，而更往下延伸擴散，以致朝廷內

外官都捲入其中，乃至天下有心士人都參與其中，聲氣相應。「東林黨」即因此崛起，以致聲勢浩大。明代政治至於萬曆時期，確實呈現出極度「混亂」的局面，「門戶紛然角立」、「交相攻訐」。在這當中，訊息傳播既是亂象，亦屬亂源，與之循環相生之輿論乃波濤洶湧，政治情勢隨之動盪不安。然而，換個角度看，這也是生氣勃發的時代，政治議題與議論激成浪潮，上下流盪，朝臣、各方官紳，以至基層士人，甚而市民階層，受其激盪，紛紛加入議論，爭鳴爭勝。天下人管天下事，輿情匯成巨浪，驚濤拍岸。滿清入關後，乃不得不高壓懷柔，觀風整俗，以收拾此殘局。

崇禎十五年，流寇與滿洲兩面夾攻，明廷漸感不支，皇帝與兵部尚書陳新甲因此試圖與大清議和，以暫緩「南北交困」的窘境。陳新甲卻不慎將秘商書信流布於外。訊息公開後，「言路譁然」，議和計畫隨之中止。皇帝為杜塞言官抨擊，將陳新甲下獄棄市。明朝救亡圖存之最後戰略胎死腹中，明朝終亡於流寇與滿洲之交攻下。由此事件略可概見，訊息傳播與輿論壓力如何牽動政情發展，而國之興亡，亦為所牽。崇禎帝居此，實難扭轉情勢，而為勢所牽，終於亡。時也？運也？命也？訊息傳播情勢使然耶！

附錄一 王汎森院士著作目錄**【專書】**

1. 《章太炎的思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5）。
2. 《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87）。
3.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 《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5. 《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6. 《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7.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
8. 《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北京：三聯書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
9. 《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4.3；北京：三聯書店，2014.1）。
10.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8）。



11. 《啟蒙是連續的嗎？》（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0.1）

【期刊論文】

1. 〈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大陸雜誌》85.4 (1992)：1-22。
2. 〈歷史記憶與歷史：以中國近世史事為例〉，《當代》91 (1993)：40-49。
3. 〈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3 (1993.9)：679-712。
4. "Fu Ssu-nien: the Latter Days of a May Fourth Youth,"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6.1 (1993): 5-53.
5. 〈心即理說的動搖與明末清初學風之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2 (1994.6)：333-372。
6. 〈道咸年間民間性儒家學派——太谷學派研究的回顧〉，《新史學》5.4 (1994.12)：141-162。
7. 〈邵懿辰 (1810-1861) 與清季思想的激烈化〉，《大陸雜誌》90.3 (1995)：1-8。
8. 〈劉師培與清末的無政府運動〉，《大陸雜誌》90.6 (1995)：1-9。
9. 〈讀傅斯年檔案札記〉，《當代》116 (1995)：30-53。
10. "The 'Daring Fool' Feng Fang (1500-1570) and His Ink Rubbing of the Stone-Inscribed Great Learning," *Ming Studies* 35 (1995): 74-91.
11. 〈明代後期的造偽與思想爭論——豐坊與《大學》石經〉，《新史學》6.4 (1995.12)：1-20。
12. 〈傅斯年與陳寅恪〉，《中國文化》12 (1995)：238-241。
13. 〈清末民初的社會觀與傅斯年〉，《清華學報》25.4 (1995)：325-343。
14. 〈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漢學研究》14.1 (1996)：177-193。
15. 〈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以章太炎為例〉，《思與言》34.3 (1996)：1-18。
16. 〈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新史學》8.2 (1997.6)：93-132。
17. 〈明末清初思想中之「宗旨」〉，《大陸雜誌》94.4 (1997)：1-4。
18. 〈清初思想趨向與《劉子節要》——兼論清初蕺山學派的分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2 (1997.6)：417-448。
19. 〈清初的講經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3 (1997.19)：503-588。
20. 〈陳寅恪與近代中國的兩種危機〉，《當代》122 (1997)：44-63。
21. 〈中國近代思想中的傳統因素：兼論思想的本質與思想的功能〉，《學人》12 (1997)：1-28。
22. 〈近代中國私人領域的政治化〉，《當代》125 (1998)：110-129。
23. 〈潘平格與清初思想界〉，《亞洲研究》23 (1997)：224-268。
24. 〈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為例〉，《二十一世紀》45 (1998)：47-54。
25. 〈明末清初儒學的宗教化——以許三禮的告天之學為例〉，

- 《新史學》9.2 (1998.6)：89-123。
26. 〈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 (1998.6)：245-294。
 27. 〈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3 (1998.9)：557-587。
 28. 〈世變與歷史思考〉，收入蔣宜芳記錄，「世變中的文學世界」系列座談會之一，「世變與文變——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世變中的文學世界專輯I) 8.4 (1998)：14-20。
 29. 〈清初的下層經世思想：陳瑚、陸世儀與蔚村〉，《大陸雜誌》98.1 (1999)：1-21。
 30. 〈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56 (2002)：1-28。
 31. 〈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學》14.4 (2003.12)：177-194。
 32. 〈從經學向史學的過渡：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歷史研究》(北京) 2005.2：59-74。
 33. 王汎森著，冰野善寬譯，〈歷史と社會：中國近代史學の回顧〉，《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26 (2005)：29-46。
 34. 〈錢穆與民國學風〉，《燕京學報》新21 (2006)：1-35。
 35. 〈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 (2008.3)：63-93。
 36. 〈從東亞交涉史料看中國〉，《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

- 1 (2008.3)：93-96。
37. 〈近代中國的線性歷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新史學》19.2 (2008.6)：1-46。
38. “The New Academic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Humanities,” 韓國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 *The Journal of Eastern Studies: Dae Dong Mun Hwa Yon Gu* 63 (2008.9): 81-100.
39. 〈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二十一世紀》113 (2009.6)：44-54。
40. 〈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古今論衡》23 (2011.12)：3-18。
41. 〈《明夷待訪錄》〈題辭〉中的十二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4.3 (2013.9)：527-555。
42. 〈近世中國焚書或反印刷言論的若干斷想〉，《古今論衡》25 (2013.11)：121-130。
43. 〈「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主義」與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思想史》創刊號 (2013)：85-137。
44. 〈「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4 (2013)：3-88。
45. 〈「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對「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6 (2015.6)：123-137。
46. 〈經學是生活的一種方式——讀《吳志仁先生遺集》〉，《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2：1-9。
47. “On the State of the Humanities in Taiwan,” *CSSAAME* (Duke University Press) 37.1 (2017): 177-180.
48. 〈從哲學史到思想史——胡適的英文《中國思想史》大綱草



- 稿》，《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3：5-13。
49. 〈明清以來的輿論社會〉，《漢學研究通訊》37.3 (2018.8)：1-6。
50. 〈五四歷史的兩條線索〉，《二十一世紀》172 (2019.4)：18-31。
51. 〈啟蒙是連續的嗎？——從晚清到五四〉，《近代史研究》2019.5 (2019.10)：5-20。
52. "Anti-ism thinkers—The post-May Fourth schism in political thought, Chinses Studies in History,"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forthcoming).

【專書（論文集）之一章】

1. 〈從傳統到反傳統——兩個思想脈絡的分析〉，收入周陽山主編，《從五四到新五四》（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9），頁242-267。
2. "Evolving Prescriptions for Social Lif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From *Qunxue* to Society," in Joshua Fogel and Peter Zarrow, eds., *Imagining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1920*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pp. 258-278.
3. 〈明末清初的一種道德嚴格主義〉，收入郝延平、魏秀梅主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頁69-81。
4. 〈方東樹與晚清學風〉，《慶祝楊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557-567。
5. 〈王國維與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論》與《夷夏東西說》為主的討論〉，收入孫敦恒、錢競編，《紀念王國維先生誕辰120周年學術論文集》（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10-31；又收入賀照田、趙汀陽主編，《學術思想評論》（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第3輯，頁473-492。
6. "Gu Jiegang," in Wang Ke-wen, ed., *Modern China: An Encyclopedia of History, Culture,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8), pp. 128-129.
7. "New Tide Society," in Wang Ke-wen, ed., *Modern China: An Encyclopedia of History, Culture,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8), pp. 242-243.
8. 〈思潮與社會條件〉，收入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頁103-143。
9. 〈明代心學家的社會角色——以顏鈞的「急救心火」為例〉，《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頁249-266。
10. 〈汪悔翁與乙丙日記——兼論清季歷史的潛流〉，《東亞近代思想與社會：李永熾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臺北：月旦出版社，1999），頁279-318。
11. 〈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125-146。

12. 〈民國史學中的新派及其批評者〉，收入羅志田主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頁31-130。
13. 〈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入周質平、Willard J. Peterson編，《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頁367-418。
14.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一件公案——再論黃宗羲與陳確的思想交涉〉，見新亞學術期刊編輯委員會編，《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會學術論文集》（收入《新亞學術集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2003〕，第14期），頁241-260。
15. “Zhang Binglin (Chang Ping-lin),” in Antonio S. Cua, ed.,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03), pp. 854-857.
16. 〈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頁161-176。
17. 〈對《文史通義·言公》篇的新認識〉，收入丘慧芬編，《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5），頁229-256。
18. 〈重讀傅斯年先生《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收入布占祥、馬亮寬主編，《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頁31-40。

19. 〈「主義」與「學問」——一九二〇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分裂〉，收入劉翠溶主編，《四分溪論學集：慶祝李遠哲先生七十壽辰》（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6），上冊，頁123-170。
20. “Preface,” in Tze-ki Hon and Robert Joseph Culp, eds.,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2007), pp. vii-xi.
21. 〈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有關「自我」的幾個問題〉，收入氏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頁171-200。
22. 〈後五四的思想變化——以人生觀問題為例〉，收入國家圖書館參考組編輯，《五四運動論著目錄初稿 (*Bibliography of Work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1949-2009*)》（《國家圖書館叢刊·專題選目類》第14種；臺北：國家圖書館，2009.3），頁47-59。
23. 〈程廷祚與程雲莊——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個研究〉，收入田浩編，《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12），頁245-271。
24. 〈「主義」與「學問」：192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分裂〉，收入許紀霖主編，《啟蒙的遺產與反思》（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12）頁221-255。
25. 〈時間感、歷史觀、思想與社會：進化思想在近代中國〉，收入陳永發主編，《明清帝國及其近現代轉型》（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1.9），頁369-394。

26. 〈胡適與傅斯年〉，收入馬亮寬、王志剛主編，《「傅斯年學術思想的傳統與現代」研討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6）。
27. 〈對思想史研究的若干考察〉，收入邵東方、夏中義編，《王元化先生九十誕辰紀念文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頁34-40。
28. 〈《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總論〉，收入國立政治大學主編，《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上冊，頁1-24。
29. “The Impact of the Linear Model of History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Brian Moloughney and Peter Zarrow, eds., *Transforming History: The Making of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35-168.
30. 〈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收入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史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9），頁353-392。
31. 〈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收入同前書，頁415-450。
32. “Foreword”, in Sheldon Pollock, Benjamin A. Elman, and Ku-ming Kevin Chang, eds., *World philolog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vii-x.
33. 〈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收入方維規主編，《思想與方法：近代中國的文化政治與知識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

- 版社，2015），頁5-22。
34. 〈晚清以來的複合性思維〉，收入同前書，頁46-51。
35.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e Cultural Sphere in the Ch'ing Dynasty”, in Willard J. Peterso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9: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Part 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606-648.
36.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導論〉，收入錢穆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4）。
37. 〈晚明文人文化的若干面相〉，收入中華文物學會編輯，《明代生活美學論壇文集·中華文物學會四十週年紀念》（臺北：中華文物學會，2019），頁10-17。
38. 〈反主義的思想家〉，《知識分子論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7輯五四專號（出版中）。
39. “Self-image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in Torbjörn Lodén ed., *What is China: Observations and Perspectives* (Royal Swedish Academy, forthcoming).

【編輯整理】

1. 杜正勝、王汎森主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
2. 〈傅斯年往來書信選：陳寅恪部份〉，連載《聯合報》，1995.12。
3. 〈史語所藏胡適與傅斯年來往函札〉，《大陸雜誌》93.3 (1996)：1-23。
4. 〈陳寅恪的未刊往來書信〉，《當代》123 (1997)：64-68；



124 (1997)：52-61。

5. 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6. 王汎森、潘光哲整理，〈張蔭麟、吳晗致傅斯年的幾封信〉，《中國學術思想論叢——何佑森先生紀念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9.3），頁365-378。
7.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全3冊。

【學術書評】

1. 〈評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新史學》3.2 (1992.6)：169-180。
2. 〈評Carlo Ginzberg,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新史學》6.3 (1995.9)：217-228。
3. 〈歷史方法與歷史想像：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中國學術》（北京）總18 (2004)：219-237。（原應為2004出版，該刊脫期，實際出版時間為2005）

附錄二 余紀忠講座編目

- | | | |
|------------|--------------|---------------------------------------|
| 2008.06.30 | 余英時 | 人文與民主 |
| 2008.06.30 | 楊振寧 | 二十世紀數學與物理的分與合 |
| 2009.06.08 | 翁啟惠 | 學術研究與社會責任 |
| 2009.12.17 | 葉嘉瑩 | 百煉鋼中繞指柔：談辛棄疾詞的欣賞 |
| 2010.12.22 | 李歐梵 | 現代文學與音樂的兩個面貌 |
| 2010.12.22 | 黃 鐸 | 氣候變遷：一個非天然的災害 |
| 2011.12.28 | 白先勇 | 從青春版《牡丹亭》及新版《玉簪記》的製作講起 |
| 2012.10.31 | Michael Crow | The Design of New American University |
| 2013.12.17 | 王德威 | 冷酷異境裡的火種：現代文學與公民社會 |
| 2015.05.19 | 金耀基 | 中國現代政治文明之探索：從民本到民主的歷史之路 |
| 2016.11.01 | 李遠哲 | 我們不能再等待 |
| 2017.05.09 | 劉遵義 | 經濟全球化的困境與前景 |
| 2018.10.30 | 葉永烜 | 眺望五十年後的今天 |
| 2019.12.17 | 王汎森 | 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 |

附錄三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暨 中央大學余紀忠講座介紹

|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

1988年12月1日，余紀忠先生宣布成立「時報文教基金會」，致力於公共政策的研究及時代更迭下新觀念、新思維的傳播。於1990年10月2日，《中國時報》創刊四十周年，余先生在紀念會上宣布成立「時報河川保護專案小組」，以實際行動關懷台灣山林河川，落實環境保育理念。自1999年12月起，面對二十一世紀台灣永續經營，主張推動「邁向公與義的社會」。2008年，「時報文教基金會」為紀念中國時報系創辦人余紀忠更名為「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本基金會以「回饋」社會、增進公共利益、強化國際學術交流、協助政府推展社會教育為宗旨，對國家公共政策與當前社會問題作長期深究與探討，並經常引進國內外新思潮與新觀念。迄今「環境與河川」及「公與義」，仍為本會兩大關注方向。



中央大學余紀忠講座

中央大學為感念傑出校友、中國時報系創辦人余紀忠先生對國家文化傳衍、人才培育之重視，特於2008年與時報文教基金會共同成立「余紀忠講座」。第一場講座於當年6月30日舉行，邀請到享譽國際的歷史學家余英時院士與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院士進行論壇，之後有翁啟惠、葉嘉瑩、李歐梵、黃 鐸、白先勇、Michael Crow、王德威、金耀基、李遠哲、劉遵義、葉永烜及王汎森諸位先生主講，演講主題從文學、戲曲、科學、經濟、天文太空到歷史，經由「余紀忠講座」的活動，帶給中大師生一場人文與科學的知識饗宴。

編後記

李瑞騰（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兼中大出版中心總編輯）

1983年，王汎森院士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讀完碩士，學位論文是〈章太炎的思想之研究〉，指導教授是李守孔和李永熾二位先生。論文於1985年題名《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幾年後，拿掉書名中間的年代，時報重出新版，王汎森並撰〈新版序〉。201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了簡體版。

在編校王院士講座實錄的過程中，我想起該書初版時，我正在準備博士論文〈晚清文學思想之研究〉的資料，我是一定會處理章太炎的文學思想的，除了《章氏叢書》，我廣泛收集並閱讀研究章太炎的專著，當然也讀了王院士的大作。我出身中文系，算是章（太炎）黃（季剛）門徒，但臺灣的中文系承接章太炎比較多的還是乾嘉考證學方面，追隨他晚年的國學講習；王院士治思想史，主要是研究五四以前的章太炎思想對儒學傳統的衝擊，對我有一定程度的衝擊。

1991年我應聘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建議系上發展「近代」，聚焦文學與思想，1994年策畫執行一個名之為「近代文學與思想」



的研討會，過程曲折，一篇探討章太炎經學思想的論文，我理想的評論人即是當時已學成歸國的王汎森，他爽快應允，作了一次精闢的評論。

因活動的學術圈子不同，多少年過去了，我和他沒什麼交集，但他在近代學術史、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已是果實累累，雖領域不同，我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此外，他在學術行政上的表現，也是口碑載道。這一次，中央大學余紀忠講座邀他主講〈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我因業務需要而參與籌備，且全程參與，確實感受到他的飽學與謙沖。能協助編此實錄，在字裡行間體會在不同社會型態中輿論的生成及其力量，從書本、報刊到網路，為政者及其人民如何面對訊息的來源和傳播，非常重要。王院士在結論中甚至已提到「自傳播」的利弊得失，談到「正向輿論」、「制衡」等等，可知他從舊時代的經驗中想找出理則以應當世，這是歷史學家的高度，卻也可見其憂懷。

余紀忠講座有其理想性，學校應該會繼續辦下去；作為重要的發起人之一，王院士也必將給予最大的支持。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王汎森：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 / 李瑞騰主編.-- 桃園市：中央大學，2020.09
面；公分.-- (余紀忠講座)
ISBN 978-986-98215-6-8(精裝)

1.輿論 2.知識分子 3.文集 4.中國

541.771

109011497

【余紀忠講座】

王汎森：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

發行人 周景揚
出版者 國立中央大學
贊助 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活動主辦 研究發展處
編印 中大出版中心、人文研究中心
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
電話 (03) 4227151 # 57103
網址 <http://ncupress.ncu.edu.tw/>

主編 李瑞騰
編輯顧問 余範英、周景揚、李光華
陳志臣、王文俊、顏上堯、蔣竹山
編輯小組 王怡靜、鄧曉婷

設計 不倒翁視覺創意 onon.art@msa.hinet.net
印刷 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時間 2020年9月
定價 新台幣200元整
ISBN 978-986-98215-6-8 (精)
GPN 1010901116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中大出版中心更換)



由國立中央大學和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聯合主辦的「余紀忠講座」，2019年邀請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主講〈近世中國的輿論社會〉。擔任引言和對談的是中文系呂文翠教授。

王院士從晚明談到晚清，乃至現代，各時期的知識份子面對當時政府與社會，如何運用各種訊息的發布與傳遞模式，以及這些訊息最終如何影響當時政治與社會發展，並形成見證時代的紀錄。時至今日，資訊與媒體快速更新，蓬勃發展，藉由王院士深刻的歷史考察，我們應以古為鑑，省思今日社會文化現象，特別是媒體操控與假新聞傳播等。

余紀忠先生為本校傑出校友，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以媒體力量推動公與義。王院士曾參與余先生深化民主的論述活動，為「余紀忠講座」創始人之一，藉此講座，也追念了余先生無私無懼的報人精神。

王院士精通書法，在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舉辦的「王汎森院士書架」揭牌儀式中揮毫，筆走龍蛇，腕底生風雷；他並當場將「觀於海者」、「誠於中樸於外」等墨寶，贈予中大典藏。

ISBN 978-986-98215-6-8



9 789869 821568

